

中国考古学（中一）

考核内容：出勤 20%，闭卷考试 80%。（10.27 期末考试）

考试：单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都城、墓葬、手工业（青铜器）；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分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遗址、遗迹；重要议题，比如夏商分界之争。

中国的青铜时代

夏商周时代和青铜时代并不完全等同。夏商周考古是以中原王朝为单位记录的，有相对固定的时间界限，即以文献所载约 2070BC—221BC。而青铜时代不同，中国不同地区青铜时代的起止时间不同，比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岭南依旧在新石器时代。总体西北、草原区与中原较早，而东南与西南晚。以中原地区第一支完整意义上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为起点，即为约 1800BC~221BC，大致时间跨度约 1600 年。

这一时期是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并最终迈向帝国制的历史阶段。从研究角度，处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早期。所谓“原史时期”，即文献稀少，且难成体系，覆盖地域非常有限。因此考古材料是研究该时段的社会进程的核心支撑。

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这一漫长时期所发生的若干关键变化：

政治形态：各个地区先后进入国家形态，社会体系中的神权色彩不断降低，国家治理日趋理性化和严密化，官僚系统与法律系统产生。

经济特征：早期城市化经济逐渐兴起，商业活动参与群体日益平民化，金融货币逐渐成型并成为经济管控核心部门之一。

技术革新：完成了两次基础冶金技术的转变，文字系统经历多次更新，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形态在标准化与专业化水平方面高速发展。

交流融合：跨地域交互网络不断扩大，且交流规模和频率都愈发提高，在青铜时代晚期形成统一帝国制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包括交流冲突）

1. 二里头文化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兴起

1.1. 新石器时代

早期——出山；开始有一些农业的萌芽，采集和农业之间的交替。

中期——聚群；农业成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社会财富等级基本平等，没有明显社会分化；

晚期——分化；社会财富分化，祭祀、殉葬。

末期——治理；东南地区良渚治水工程，西北地区石峁遗址大规模改造工程。出现**国家形态的影子**。**中国国家形态的出现**认为有 5000 多年，以**良渚文化**为开端。实际上，不只是中原地区，甚至东南和西北要早于中原地区，不过良渚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倒退。而中原地区则出现了一套国家制度，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

中国早期国家的兴起可能并非在一时一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可能已经迈过了国家社会的门槛，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这些地区在摸索中形成的早期国家都未能在本地区形成长期延续的政治模式。而相对而言，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末期则显得相对混乱。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段的社会形势与技术更新（2500~2000BC 或 1800BC）

（1）从遗址密度上看，较仰韶时期大幅度增加，意味着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的中下游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客省庄文化、陶寺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但**没有特大规模的聚落遗存**。

（2）技术方面，开始出现小型铜器，但数量和质量优先。

（3）高等级的物质文化上，相比于石峁和良渚，在玉器等宗教用品上投入的精力有限，说明不及良渚和石峁的社会复杂程度。

（4）在宏观聚落形态方面，大量中小型带有城墙的聚落被建立起来，多数地区的聚落层级能达到 3 级分化。但即使少数地区如山东存在 4 级聚落分层，也缺乏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超大型聚落，时常被称为“**万邦林立**”。——**小型聚落多，但没有超大型聚落**；

（5）人群行为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暴力活动的大量出现，群体性、制度化的杀戮活动在各个遗址频繁出现。——中原地区的暴力杀人冲突较其他地方多，制度化的杀戮活动，表明社会正在处于非常动荡的时期，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和冲突，也预示着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的杀殉现象，陶寺遗址宫殿区发现被处死的女性，头盖骨饮杯。

*国家形态一般需要四级社会分化，中原地区的聚落基本没有实现。

1.2. 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认知（历史文献的角度）

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前，历史文献是追溯中国国家起源的唯一途径。由于长期以来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中国各王朝对夏、商、周三代充满着崇敬的意念，因此也有大量的晚期文献追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

“早期国家”，严格意义上讲指的是中原地区晚商以前的政权。已经有历史文献记载，但不能确定记述者，即缺乏有效同时期文字记录的时期。即使最早的文献，成书时代也基本都在春秋时期以后了，距离夏代、商代早期已经过去 1200 年以上。模糊的时间框架、模糊的地理描述、模糊的人物与事件，都造成后世历史研究者面对这一时期时的困惑。因此，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认知基本都要依赖考古学手段。

最常见的关于禹的形象，已经是东汉画像石，距离夏代过去近 2000 年。

问题：传说中夏文化时期，夏文化的地域，可能同时分布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首当其冲的问题，夏、商、西周各代都持续了多少年？不同文献记载各异。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发展水平、考古材料与历史性质认定模糊等一系列问题。不同研究者存在巨大意见分歧，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争论最激烈的部分之一。争议的主要分歧在于，考古学家确确实实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年代在约 **BC2000~BC1300** 的古代遗存，且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考古学方法评价，其社会发展水平以达到国家形态，但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是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后世文献中的谁”。

***考古学遗存、族属、政治实体以及王朝更替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依据历史文献搭建的夏商周三代的时间框架（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见）

夏：约 2070~1600BC；

商早期：约 1600~1300BC；

商晚期：约 1300~1046BC；

西周：1046~771BC

对夏王朝在考古学材料上的反映的研究，**目前的主要研判逻辑思路为**：哪支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文献中的夏纪年）、出现在特定地域（文献中的夏统治区），则它就是夏王朝的考古学遗存。

一些出土文字材料中有提到夏、禹的记载。不过这些出土材料也都是至少西周中期以后人们

的陈述了，距离文献所划定的夏禹之时也有 1000 年的间隔。且无法提供时间、地域等其他有效信息。（春秋秦公墓、西周幽公盥）

1.3. 对于夏的探索

《左传》中经常提到的夏活跃的两个目标区域，（1）**豫西地区**；（2）**晋南地区**。

那么首先对于夏，依据最线性化的逻辑，应该是在这两个地区找到一支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它的存续范围刚好是在 2070~1600BC 之间。

按照考古学逻辑，我们简单粗暴地把大约在 2070BC~1600BC 出现在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认定为夏文化。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

- （1） 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多支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时段并行存续在该区域，且往往有较为复杂的地方类型。（地点）
- （2） 这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在时间范围上跨越文献构筑的夏代的上限或下限。即没有单支考古学文化恰好能够覆盖整个文献中的夏纪年。测年结果的屡次变化影响对考古材料的解读立场。（时代）
- （3） 即使是单个典型遗址，其发展过程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没有一个一致能够完整覆盖夏纪年（一个遗址可以有多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部分被提名为夏王朝都城的遗址规模和物质内涵明显无法达到区域绝对优势（尤其是和商、西周时期的情况相比）。（时代、规模）
- （4） 晚期文献本身构建的时空框架是否完全牢靠。（证人对案发时间、地点的回忆是完全准确的吗？）（文献的可靠性）

困境和逻辑：对于“谁是夏”的认知变迁，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成为了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发展的缩影。其中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对于真正意义上中国第一支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测年结果。而每一次对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的变更，就造成此前的历史学解释重构一次，并需要从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去填补一段，或从二里头文化中删减一段。

早期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文化，但随着测年技术的发展，二里头文化的起始阶段不断后调，仅能涵盖文献中的夏晚期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文献中夏纪年的空缺，研究者开始在早于二里头文化中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中寻找可能的物质遗存迹象，并辨识为夏王朝遗存。其中的主要考察对象为王湾三

期文化和新砦期遗存。

1.4. 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中指认夏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2500~1800BC）

- 河南省中部地区；
- 文化存续时间为 2500~1800BC，对比文献推算，晚期阶段可能对应夏代早期。
-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被推测为禹都）；
- 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被推测为夏启都）；

王湾三期文化存在一个逐渐向南扩展的过程。

王湾遗址中发现祭祀坑，人骨和动物骨架，这类灰坑乱葬坑在王湾三期文化中频繁出现，坑内的人骨多身首异处，肢体残缺，都系非正常死亡。——已经出现**制度化杀戮**现象，说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约 2200~1835BC）

时间上基本满足夏文化早期，与二里头文化相接的一个文献记载的范围。

但认为一个城址是王朝，需要指认王都，但放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王都的大小似乎不能构成一个王城的要求。——首先在 2200BC 左右建造了两座小城，仅 1 万平方米；后在 2100~2050BC 左右修建了一座大城，约 35 万平方米。

遗存反映出也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出土陶器）

后世文献称“禹都阳城”，而王城岗遗址附近是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

新砦期遗存（1850~1750BC）

*河南郑州新密 新砦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

嵩山东部的区域性中心聚落。

主体年代弥合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断代残缺情况。

具有城墙和城壕，遗址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分布最大范围约 100 万平方米），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的新砦期城址。

大型建筑“大型浅穴式露天建筑基址”，是**权力集中**的一个体现，是一个中心性遗址。

但是，王湾三期和新砦期文化还不能算作进入青铜时代，依旧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只是发现红铜器和深铜器，没有发现青铜器。

除新砦遗址外，较为重要的新砦期遗址还有**花地嘴**和**东赵**，但面积都更小。在**陶器**方面，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连续发展传统**，即暗示**人群主体的延续性是较强的**。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新砦期遗址，**集中性粮仓遗址**，大量小型圆形房屋，特殊的房屋结构。仓储被城墙和壕沟围绕，反映出**对基础食物资源控制模式的变化**。

※**关键困惑**——在上述的这些遗址和考古学文化的存续期（特别是王城岗和新砦遗址），对比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2300~1800BC），它们无论在**规模、社会复杂程度、技术先进性、大规模治理活动与军事力量**来看，都显得非常弱势，直到大约公元前 1750 的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才发生根本变化。

所以，对于 2000~1750BC 这段时间范围内中原地区所发现的这些考古遗存的历史学身份，仍是未来考古工作需要努力探索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

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530，一般划为四期。可能为夏王朝晚期阶段遗存。

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原地区开始超越周边地区的关键时期。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真正可以被称为都城。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里头文化有六个地方类型，以**陶器**为标准，陶器是早期分期和地域划分的主要标准。二里头文化延续龙山文化的传统，炊器用“实三足器”而不用“空三足器”，到商代吃饭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三足器主要是用于酒器和礼器。（看陶器要善于肢解，鬲+三个泥片成为三足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陶文**值得注意，“刻画符号”，还不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

范围实际上一定不会是画红线的区域，更多应该是后期破坏的原因。目前没有看到城圈，只有非常小的宫墙城墙，早商阶段和中商阶段都是有城圈的，而晚商阶段也没有。“**大都无城**”的说法，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两个支撑。

道路系统：井字格，宫城南侧发现车辙痕迹，有可能是人力或其他动物，但大概率不是马车，车辙的宽度不够，中国最早的马车大约在商代晚期。

宫殿区筑有宫城墙，由很多庭院围合而成，廊屋式建筑。一号宫殿遗址约一万平方米，已经

不是住宅而是公共场所或权力机构。从遗址来看，应该分两层，但不是两层楼房。没有中轴线的概念，**散点式庭院分布**。**中轴线建筑实际上是集权化的体现**，明显的中轴线分布至少要到殷墟时代。

中国铜器技术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对大量的青铜器，在冶金技术和青铜器的复杂度上都有飞跃。宫城南侧的作坊区，把重要作坊放在宫殿区附近的做法从二里头开始（更早期石峁也有），一直到西周时期把大型作坊放到统治者身边是一种习惯，直到东周时期城市管理体系才发生变化。

黄铜器：铜锌合金；青铜器：铜锡铅合金，人工有意识加进去而非矿体本身自带。红铜器为纯铜器；深铜器不是作为人工合成物加进去的，是矿物本身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的铜器种类增多，复杂铜容器，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复合范（腔体的东西都需要复合范），确立了整个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基调。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典型特征在于铜容器的发展，复杂装饰等。兵器、乐器（如铜铃）、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还较粗糙，到商代技术掌握明显更好，如兵器、容器等不同器物各金属比例会固定下来。

*二里头文化一定是青铜时代，但存在夏文化是否是青铜时代的问题。实际上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纪年已经进入商代，文献记载的王朝纪年与考古发掘之间的龃龉。

绿松石矿经常与铜矿伴生。绿松石作坊，贵族奢侈品，集中在作坊区，不太可能是平民使用。绿松石器物成品在二里头遗址也有很多发现。2002 年中型墓中发现由两千片绿松石片粘连的龙形装饰，大概是衣服装饰，配合玉来做。

二里头遗址需要很多资源，如铜矿、绿松石、玉器等。构成二里头文化的扩张需求，晋南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扩展点。绛县西吴壁遗址。对矿产资源的掌握动力。

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后续文化的影响

玉器、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是衣服装饰）。

玉牙璋，细腻纹饰，二里头文化之后在整个东亚地区广泛分布。

2. 早商王朝的扩张与重组

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中晚期，早期夏文化是否能够在考古学遗存上有所表现，两个线索，（1）王湾三期末期阶段，BC2050~BC1850；（2）新砦期遗存，BC1850~1750，可能被认为夏的早

期阶段的后半部分。似乎还不构成具有绝对地区性优势的考古学文化，中心性遗址的规模、青铜器制作水平等，都与此后的二里头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

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

聚落层级规模的等级差异反映出社会的复杂程度（国家社会、区域性复杂社会、简单社会）。

——简单的例子，聚落规模如何反映社会等级的复杂性。一般来看，国家形态一般要维持四级聚落体系，帝国形态要维持五级聚落体系。市—县—乡—村庄；淮河平原卫星图片，找地理环境比较均一的理想模型。明显四级分化。——数量级的差别，至少要差一个0才可以。100万，10万。

2.1. 商代历史概要

回顾商代历史概要，文献上比夏时期多很多。明确世系概念。夏的世系无法根据当时人或紧邻当时人的口述来记录。晚商时期有明确大规模的文字记载——甲骨。先商时期的领袖在甲骨文当中也有明确记载，而且有顺序。每隔一定日子就要祭祀某一位王，是不断循环的。

商代历史简单的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先商时期——商汤以前。

早商时期——商汤开始，王朝时期，但没有同时期文字记载，一直到殷墟之前。

晚商时期——殷墟时期开始，有绝对的同时期记载。

王国维先生，商先公先王考，小屯出土的甲骨，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对的，但是顺序有问题，基本名称和人的位数是不缺的。

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和进入秦汉以后帝国制的王朝更替有区别，帝国之后一般是内部原因，农民起义或贵族造反；或者外来民族夺取政权，如元、清。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更接近于后者，当夏王朝存在的时候，商人已经在某个区域有自己的生活传统，只是后来由于商人的某些移动（南下），侵占了二里头文化的区域，征服了夏王朝，建立商王朝。（周人也是很早就存在，生活在陕西地区，名义上有臣属关系，但也是独立的政权，后来征服了商王朝。）

夏文化本身向前追溯，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有很多考古学文化，包括中原河南省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文化），河北省后岗二期文化。

河北省靠太行山东麓地区，形成**下七堽文化**，由早期的后岗二期文化演变而来。从陶器上看有延续性。与二里头文化并行，有一定重叠，而且有暴力冲突，城址里面有砍人头扒头皮作酒杯。（龙山时代晚期，邯郸涧沟遗址，下七堽文化的早一阶段，同样的头盖骨酒杯习俗）

历史性质判断，有学者认为是“先商文化”，但可能是有问题的。应该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了

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取代了夏王朝。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先商文化研究，重点讨论二里岗文化的来源，**下七堧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在陶器上的延续性**也比较明确。一度有学者提出商文化主要来自于豫东地区和山东省西部，商丘到菏泽一带。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好像对此产生疑问。——商文化应该是混合的群体，主体部分是下七堧文化，还有一部分豫东和山东省西部的人，混合形成二里岗文化。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商王朝似乎经常迁都。《史记》“前八后五”，商汤之前，先商时期迁都八次，无法证实。先商文化无法发现，下七堧文化的遗址点面积和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小很多，十几万平方米/三百万平方米。说都城是比较奇怪的，而且说都城是进入国家政体。达不到四级聚落体系，至多二三级，青铜器以装饰品小工具为主，没有做大型兵器的能力，以红铜器为主，青铜用得非常少。商汤之后五次，比较集中，从商代进入中期到盘庚迁殷（晚商）之间有连续性的迁都。商代中期中心性遗址衰落，出现很多并行城址。

2.2. 二里岗文化

以郑州市二里岗遗址为代表性。现在的郑州市市中心。

BC1600~1400，和二里头文化明确接续在一起。对于历史性质的判断曾经发生过多变化。没有 C14 测年技术的情况下，定位为商中期，二里头定位为早商。（早期靠猜和相对年代）C14 之后，压到商王朝开始阶段。

商文化典型的器物是陶鬲本身的变化。

二里头的炊具，实三足器，扁足鼎；二里岗时期，空三足器的鬲。（接续下七堧文化，和二里头不同；和殷墟时代结束，空三足器的鬲也还是一样的，有连续。殷墟的文化可以有文字自证，可以证明是商王朝本身的遗存，陶器延续性非常强）

二里岗，明显特征，**军事能力**的上升。二里岗时期在重要据点（地域性中心据点/交通枢纽）都会修建**大型城墙系统**。二里头本身没有城墙。

青铜冶铸能力上升。

二里岗文化的人群大规模进入长江中游地区。

二里岗文化动态分布状态，最典型的**尖足鬲**。（二里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陶鬲）



二里岗上层（早晚期）、下层（早晚期）；

下层早段，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承接了原来二里头的分布范围，不仅仅是大地域，在小区域上接手，比如东下冯遗址。直接居住在原来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之上。二里头遗址在旁边离的很近的位置新建了一座城，居住在那里。也没有被完全毁灭掉。

二里岗下层晚段，开始进入向南扩张，河南省南部地区，到靠近长江中游地区。

二里岗上层阶段达到早商阶段最大的分布范围。西部达到陕西省西部，周人开始生长的点，似乎是周人接手了废弃掉的二里岗遗址。武汉市第一个大型遗址盘龙城遗址（长江中游地区），济南第一个大型遗址大兴庄遗址。（现在的现代化城市在二里岗时期开始出现雏形）

偃师商城遗址

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站在洛河边基本可以互看到。总体上面积在数量级上比较接近，三百万平方米。偃师商城有城圈，城圈外也是有东西的。年代上比较晚，主体文化年代是二里岗文化的。（尖足鬲）

城市东南角天然湖泊，围壕。

宫殿区，散点式庭院分布，和二里头遗址一样，不存在中轴线。宫城后面挖大型槽子（池苑），核心宫殿区中心供水，军事设施，储水，规整，体积很大。进水道和出水道，石子铺。从最外的壕沟湖泊两边一直灌进来，宫城供水系统。周原遗址的更大，给整个城市用，偃师商城遗址的是给宫殿用的。

少量铸铜作坊，铜渣，有铜器铸造能力。只限于**小型工具和小型兵器**。**纹饰复杂的重型青铜器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集中在**郑州商城**内。——集中核心青铜铸造能力。

郑州商城遗址

体量比偃师商城大很多。中原地区城市发展史上的跨越式发展。

完全压在郑州市市中心之下。发掘很困难。汉代以来很多正县的县城就压在上面，城市破坏

很严重。内方外圆的系统。北半部分基本已经被破坏完了，东面没有发现城墙，东面有一个**大湖泊**。水源供给、城市安全。

内部遗存可以分为几种，（1）城市宫殿区。内城并不完全是宫城系统，主要在东北部。一般认为郑州商城统治者主要居住在这一区域。（2）手工业作坊，铸铜、制骨；这个区域之外和外城之间。和同时期其他的铸铜作坊相比高出很多。

郑州商城的城墙是个心，在里面，历朝历代都在使用这个城墙，一层一层往外补。直到清代，还是正县的城墙。夯土里面有陶片（尖足鬲），卡在商时代。

郑州商城的夯土质量是目前来看最好的。

东北角是宫殿区，由于这一区域被破坏得很严重，历朝历代的主要生活区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发现有一些相对来说保存得比较完好的遗迹。F15、F16 大型夯土建筑；蓄水池和输水暗道。非常长的长条形建筑，只有边缘有柱洞，中间没有，起不了二层。重檐式屋顶。长度大约是 65m，纵深 15m 左右，单体来说太大，应该不是用来日常居住。

和偃师商城很像的排水系统。整齐修整后的石头铺设的蓄水池，不再是简单的挖一个池子。郑州商城内部有很多暗的供水和排水渠道，挖沟、砌石头，封在地下。瘦长的长方形，两边接进出水渠道。

郑州商城内部人员身份比较杂，一方面反映城市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居住在城市内也不定都从事非农业生产。内城主要居住贵族；内城和外城之间的区域居住手工业者，还包括一些农业从事者，相当比例农业收割相关工具。和后来殷墟时期、周原、西周、东周时期，不仅仅看到城市本体的扩大和手工业作坊的增加；城市人口工作的主要内容也发生变化，城市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逐渐降低到不存在。“国野之分”还不是非常明确，城乡对立也没有很明确，专职化差异不是很大。晚商时期开始增大。

郑州商城内部商文化特色的典型遗存。和下七堎文化连续的特征，承接晚商，反映商王朝是怎样统治国家的。商王朝是宗教狂热的国家，杀人祭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内部蓄水池不远处**制骨作坊**，郑州商城大规模制骨作坊，后来规模越来越大。郑州商城这一处主要是以人骨为加工材料，尤其是人头。其他制骨作坊都是以牛骨为主。一方面掠夺资源，一方面掠夺人。宫殿区发现的人头骨坑，不是用来杀人祭祀的，而是用来做头盖骨杯子的，很多是锯开的，有痕迹。头骨基本都是男性青壮年，有伤痕，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战争中的战俘。

有文字发现，表明早商时期应该出现了文字，虽然系统性还不是很强。字的数量还比较早，

单词型，还不是长话。目前主流的认识是商汤建立的亳都。郑州商城出土战国时期的陶文，“亳”，战国时期这个地方叫“亳”。从侧面印证郑州商城早期叫“亳”。二里岗时期商的最大都城，一般就认为是商汤所居的亳都。

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作坊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废料堆积开始是公斤计的，西周时期以吨计，战国时期以十吨计。

手工业作坊的专业化，种类减少，专项的量增大。

作坊内的服务对象在发生变化。二里头时期包括到郑州商城时期，为高级贵族和普通平民生产陶器都是在同一个作坊。越往后期，逐渐分开。

郑州商城内部发现了很多手工业作坊。商人是以生产和贸易起家群体。制陶作坊、制骨作坊。

判断制陶作坊（而不是居住点）——烧坏的废品，大部分成品都被拿走了。

制陶作坊一方面为普通平民生产，一方面为贵族，复杂装饰。

青铜器作坊，两类青铜存在方式，成品本身，墓葬中发现，但没有发现商王级别的大墓，中小型墓葬为主，没看到王陵；青铜器比二里头时期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很多；复杂纹饰，虎头兽面。兵器上，简单的网格纹（二里头）到复杂装饰，镂空器（二里岗），更多的精力放在铜容器，强大的青铜生产能力，复杂的铜容器，郑州商城的作坊中才发现相关铜容器的陶范和陶模。兽面、牺首（二次铸造，本体+配饰+焊铸）。装饰还没有达到晚商时期复杂的三层花纹，都是一层花纹。技术上的特点，二里头时期到早商时期的变化。圈足器有孔洞，技术上的不同。干脆做成装饰，十字形，支钉。后来从陶支钉到铜来做，把洞堵上，垫片。可以铸造多节的带空腔的器物。

陶范，成品，证明郑州商城出土容器都是内部铸造的。

郑州商城的衰落，公元前 1400 年左右进入衰落期，废弃掉，陶器的分布范围逐渐降低，人口密度越来越少，居址面积越来越小，小型居民点。

特殊遗存反映城市结束，**青铜器窖藏**。重点是三处，张寨南街、南顺城街、向阳回族食品厂。都在内城的外墙边上，没有宫殿区内部发现的，且器物都很大。器物的体型都很大，往往是成套建筑，摞得很整齐。不是祭祀场景，否则应该放有动物骨骼。把器物本身摞起来，成套，大中小一套下来。贵族在大规模撤离之前把东西埋在城墙边上。——早商时期发现最大型的青铜器的点，反映二里头时期到早商时期中国工业能力激增式的发展。

重量翻倍。200 年的时间内，超过 100 倍的增加。青铜工业能力的大幅提升也意味着资源需求量的激增，（青铜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争夺和控制铜矿资源。军工复合体，一方面要打仗来获得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高增长来提高军事能力继续打仗。

2.3. 商文化扩张的物质现象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明显扩张，其中向南和向东幅度比较大，向西的扩张虽然延伸的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最重要。

山西省南部，晋南地区的扩展（向西）：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

二里头文化重要类型，二里头文化结束之后，二里岗对原有二里头的直接继承，变成非常重要的据点。处在山西省南部的重要资源点上，解州盐池；中条山铜矿。临近西吴壁矿冶遗址。城圈，有壕沟的体系，小圈圈的圆形房子，面积不大，住人并不方便。这些房子是二里岗早商时期的，认为可能是粮仓。2000 年之后研究，怀疑是**盐仓**。取样不能取单一样，而要取序列样品，测序列。靠近房屋基面，金属离子超标，和本遗址周边的土有差别。证明上面应该是囤盐的。

西吴壁遗址

西吴壁遗址是延续性的，二里头延续到二里岗的冶铜点。有粗炼铜的能力，但没有生产青铜礼器的能力。只有铸造小型工具的能力。

垣曲商城遗址

不仅要掌握资源点，还要掌握交通线。

现在遗址已经淹到小浪底水库下面了。

卡在黄河河道上的渡口点。城市不大，小型遗址仍然建立了完整的城墙系统。

建设有夹层城墙，有夹道，严密的防守体系。

向南的扩展：

黄陂盘龙城遗址

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在河边。商文化据点，城市。

整个盘龙城也被淹到了水下去，盘龙湖，搞水下考古。修一条水坝，把水抽干。

目前看到的二里岗时期长江流域最大城市，两层城圈。总体面积大约 400 万平方米，接近于二里头遗址，接近于郑州商城的四分之一。

城市的目标很清楚，军事目的性很强。离长江主河道很近。（建在支流上比较安全，洪水容易淹掉）。

目标可能为湖北铜绿山铜矿和江西瑞昌铜岭铜矿区，当地人开采，交贡。

前后连间的宫殿式建筑，长院落，多进式。后来建筑越来越长。

中型墓葬，出土非常精美的铜器，还包括铜钺，早商时期最大的一件铜钺，军事性质很强。中国最大的一件玉戈。装饰性很强的青铜礼器。绿松石镶嵌的青铜兽面，可能是嵌在皮制品上用来穿戴。

盘龙城统治者应该是来自早商的商文化，商文化器物。但没有发现相应的生产能力。只有一些简单的陶范。

商王朝向东的扩展

没有明确原因，但方向是清楚的。

原有二里头时期，山东省是岳石文化的分布区，斗鸡台文化。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并入到二里岗文化的范围内。斗鸡台当地的陶器基本变为二里岗陶器，几乎完全融入。岳石文化看来是向山东半岛移动，珍珠门文化，整个西周时期都坚强存活，到春秋时期。

岳石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争夺的区域是济南大辛庄遗址。早商时期重要据点，典型二里岗文化铜鼎，发现晚商时期的带字甲骨，殷墟以外唯一发现带字甲骨的地方。在商代晚期变成最重要的地区。

2.4. 早商文化的终结

公元前 1400~1250（殷墟）之间，出现空档期。中原地区没有超大型聚落，比较大型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差着数量级的小。持续年代很短。迅速衰落。可能对应商中期严重的内斗。

洹北商城

离殷墟很近，在黄河北边。（殷墟在黄河南边）

城墙只有槽子，城墙还没建就废了。城市内部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存。**洹北商城 F1** 整个商时期单体建筑最大的建筑。单体庭院式建筑。**内部也存在铸铜作坊，生产青铜礼器。**——即使小但也可能是都城。

大规模制骨作坊，使用牛骨。与城市内部肉食供给能力相关。

持续时间很短。

郑州小双桥遗址

年代差不多；面积更小。没有看到明确的城圈，郑州市西北郊，离郑州商城不远。

反映出一些高等级的因素，青铜建筑构件（中国第一次发现），横梁装饰件。

和文字相关的重要发现，不是刻在甲骨上，而是以朱书和墨书的方式画在陶器上，是成系统的文字了，和晚商之间有联系。反映是高等级遗址。

是否与商王不断迁都有关系还可以考虑。

晚商王朝的政治与经济霸权（※）

1250BC~商朝灭亡

中商时期的考古学发现是正在进行的，最晚定义，1400BC~1250BC。城址单体体量较大，但没有超级中心。在 1250BC，商王朝的中心稳定在了河南安阳。

盘庚迁殷，晚商时期才可以叫“殷商”时期。

有关殷墟的文献记载

殷墟是“殷之墟”，其为商代王朝，有二说，（1）盘庚所迁之殷（主流观点）；（2）河亶甲之“相”。（近来考古学家认为可能两种观点都是对的）

殷墟时期安阳地区的自然环境

与今天大多是人造地表（如农田）不同，当时主要是非开垦部分，落叶阔叶林。气温相比现在偏暖，大约相当于今天江淮地区的气候。

殷墟周围大概是有较多象的，发现完整象骨架，象的脖子上还系有铃铛，证明有人工驯养。

关于甲骨文中的“兕”是否是指犀牛，还不能完全确定。

殷墟遗址

殷墟似乎没有城墙，但最近考古学家认为可能还是存在城墙，只是没有发现。从商早中期还是可以看出其重视防御，建设城墙。

殷墟的面积跨越数量级的增长，面积 30 平方公里，直到西周时期也基本是这一数量级。

殷墟遗址是公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而且发掘时间长、规模大、内涵丰富，是商代后期考古的核心对象。（对殷墟的发掘从 1928 年至今，基本只有抗战时间有暂停）

殷墟有两个中心点：（1）洹河以南以小屯、花园庄为中心的宗庙宫殿区；（2）洹河以北侯家庄、武官村北的王陵区。

洹河以南有墓葬，也有手工业作坊。发现居址区和墓地区是混着的，“**居葬合一**”，是商文化非常有特点的“生死”模式，尤其是对于中下层平民。埋葬在何处实际上与所属地的所属权有关。而商王埋葬的地区不在其中。

宫殿区——小屯宗庙宫殿区

宫殿区内主要遗迹：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墓葬；

*大量祭祀遗址，在西周遗址中是基本没有的。墓葬比较特殊，数量很少。

宫殿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功能区，包括了宗庙、朝堂、祭坛、居住场所、作坊（主要是制玉和其他高级工业品）、储藏间（大型仓库）、特殊墓地。

早期考古学发展不够完善，对于宫殿区的很多发掘资料可能有缺失和错误。

M5，妇好墓；M14，一位军事将领的墓葬。

甲组一般认为是仓库，或宫殿服务人员的居住区；乙组认为是朝廷宗庙或王族居住区；丙组认为是一个祭坛。

• 乙组建筑（中心）

成中轴线方式布置，首次看到。大型主体建筑通过廊道建筑连接。主体建筑朝南。

• 甲组建筑

南北长、东西窄的房间，今天一般仓库是这样造，长条状，出货进货方便。（如汉代发现的大量武库建筑等，一般都是长条建筑）

对甲组建筑的判断是仓库或附属人员的居住区。

• 丙组建筑

总体面积很小，每一部分也很小，应该是组成一个较大的建筑，发现有祭祀坑，埋藏大量人和动物，估计没有屋顶。判定是一个祭台类建筑。

建筑群布局特点

和二里头遗址对比，整个一号遗址就是孤零零一个建筑。殷墟遗址多座成组，构成建筑群，可见在建设之前有规划，不可能想到临时加建。

基本认为，乙组建筑北部小体量建筑更早一些，越大体量的建筑越晚。

房屋建造与结构特点

更多是木柱支撑。

柱础石小，没法起高楼（可能存在层檐建筑，并不是真正的二层）。到西周建筑，形成一个柱础坑，填入很多石头，可以立较大的柱子，间隔大，建筑体量变大。

殷墟发现的“瓦”非常少，茅草顶。西周遗址的发现“瓦”很多，复原时一般采用“瓦”。

宫殿内的祭祀遗存

（1） 与建筑建设有关；

“落柱”、“起梁”，一般会进行祭祀活动。

（2） 与建筑本身的使用目的有关；（更多）

殷墟主要的祭品：①人牲；②动物；③车马等高级工业产品；其中，人牲是最多的，体现商王朝的军事霸权。——军事霸权的重要反映就是战争的胜利，战俘很多。

宫殿区内的墓葬

身份特殊，与王室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但身份又不够高。

妇好墓，发掘过程中墓室基本被水浸泡。2000 件非常精美的文物，但一直没有比较精确的平面图。商文化典型器物和埋葬习俗。

墓葬中有 16 具殉人。墓中有大量青铜器出现，很多器物上发现两种主要铭文，“妇好”，“司母辛”，都是指妇好这个人。还有铭文写其他人的名字，大约是下葬过程中送器物者的名字，其他国家的赠赋。

象牙，当地的祭祀用品，也可能是进口而来，南北交换，主要的两种物品是龟甲和象牙。还有其他一些装饰品，单个墓中发簪量最大的墓，“骨笄”，一共 499 根。

妇好墓出现兵器。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尤其周墓，一般女性墓和男性墓随葬品差别较大，男性有兵器。

花园庄 M54，军事将领墓葬，铭文“亚长”，“亚长墓”，应该是将领的名字。妇好是商王配偶，将领应该也有特殊身份。发现青铜右手，可能将领的战死与失去右手有关，由于特殊的纪念。墓主人的牙齿残留鉴定，该将领是江淮地区人，而为其殉葬的都是安阳本地人。15 个殉人，9 条殉狗。单个墓中出土青铜钺最多的。

甲骨埋藏坑

王室有“贞人”，基本带字的刻辞甲骨都发现在宫殿区。单点的埋藏量很大。“以鬼神而行事”，基本无事不卜。

YH127 以龟甲为主；小屯南地以牛肩胛骨为主。可能与占卜的类型、等级或贞人的习惯有关。

占卜流程：背面钻出圆孔，侧面凿出侧孔，另外一面刻字。用烧热的木条烫这些圆孔，在正面裂开，形成“兆”，贞人根据形状进行解释。

甲骨内容：大量占卜与战争或战争结果有关，商王的主要敌人，“羌”（商的西北地区，关中西部）、“邛方”。还有一些甲骨与赏赐大臣有关，打猎，作为叙事性的内容而非占卜，宰丰骨匕，雕花、绿松石镶嵌。

殷墟王陵区——西北冈王陵

目前已知最早的王陵和王陵集中埋葬区。

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地区，商王陵是比较特殊的存在，没有“居葬合一”的情况。西周和夏两个相对比较强势的王朝并没有王陵，直到东周才有。殷墟王陵是早期最高等级的王陵遗存。王陵区分东西两部分，西边是四墓道大墓，东边比较混乱，还有两墓道、一墓道的小墓。西

区有尚未完成的大墓 1 座，也没有殉人，但体量很大。可以看出是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完工，大约是帝辛的墓。

四墓道大墓是商王陵墓。但目前看来，在一些特殊的重要方国中，最高级首领可能也能享受到四墓道大墓即商王地位，但只发现一例。

墓室木板痕迹，用木板铺一遍。兵器数量越多和地位成正比。

商墓是台阶，周墓是坡道，要把整个车拖下去。

商王祭祀制度，“周祭”制度，不断进行循环。——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祭祀坑排列。

王陵区以外的墓地和墓葬

宗族体系埋葬。

现在城市内的埋葬体系完全与财富等有关，城市不以血缘为基础。

族徽

一种符号，而不是字，或者说，可以理解为一组字的集合。

族徽并不是某个人的私名。

“亚”字框，把字/图画画在里面，一般会称为“亚 X”。

最近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族徽”可能是一种官名。每个族墓地的族徽并不是统一的，族徽的多样性情况很大，可能是家族里面的人做不同的官职。族徽代表商王朝行政系统的职位。——但无论怎么说，拥有相同族徽的人拥有相同的身份。

商王朝的统治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式统治，战争、俘虏、砍人，对于商王朝的军事政治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军事霸权——战争的胜利。

殷墟的大型手工业作坊

商王朝是手工业水平发展最快的时期，西周制度的改变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模式上的改变，下一时期的重大技术突破要在东周时期。

殷墟时期也是中国第一次早期城市化的高峰，大型专职化手工业生产的广泛出现。殷墟出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雏形，真正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从战国开始，度量衡、奖惩制度。

*评价手工业程度——专业化程度（评价生产者）、标准化程度（产品本身）

一般来说，标准化水平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高等奢侈品除外，高度专业化、定制化，但不会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好处是可以降低生产者的入行门槛，降低生产者对生产本身的理解，章程本身由别人规定。

手工业作坊的管理体系出现变化，不仅是技术基础的问题，还是**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

殷墟的作坊可能是由各个家族管理的，但又不专门服务于某个家族，超出本家支的供应之外。

出现很多竞争式的作坊。

作坊基本是全职的手工业作坊，不仅是兼职或临时性的生产者，农闲时、生产工具、生产设施都比较简陋，小型作坊一般加工半成品等。而殷墟的作坊拥有整个生产链条。同时期中小型遗址中的手工业生产遗存会有不少农具（石刀、石镰等），甚至占多数；而殷墟手工业作坊遗存几乎没有农具工具的发现。

（一）铜工业——工业基础（高端） 产能、技术

采矿，中国铜矿资源分布很不均衡，不是每一个地点都有铜矿。中国大都城没有建在铜矿边上，涉及到运输问题。

翻范，用细腻的泥淋到模上面，泥是需要进行发酵的，里面不能有有机质。阴干，切下来“分范”、“烘范”，陶范属于一种“半硬半软”的状态，比较“酥”。“陶模”是可以使用多次的，而“陶范”是一次性的，毁掉提取成品。

铸造较大型铜器时由于铜液难以快速流遍整个模，可能会留下空腔，可以补铸、修整、打磨。

作坊的遗存——模、没有用的陶范、被砸掉的陶范、熔炉本身、铜渣（绿点，打磨过程）

陶模和青铜器本身是一样的。

很多发掘的铜器在手工业作坊当中都有反映。王陵区使用的大量青铜器并非由外界输送，而是城市本身生产的。另外，商王朝对周边地区铜器的输送量也是很大的，拥有先进的技术。

带铭文的青铜器——殷墟时期是铸铭，到战国时期是刻铭。涉及到所属者，铸铭在做之前就已经能确定主人是谁，而刻铭是买卖之后再刻上自己的名字。——本身是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体现。当然也和制造基础有关系，在铜器上刻字是比较难的，需要比铜更坚硬的器物。铸

铭铜器不是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购买的。

铜铎和铅铎在商周时期基本都是“饼状”，就是容器本身的样子。

这一时期是铜器重量增长特别快的时期。

（二）陶作坊（低端） 组织

尤其是日用陶器的生产，我们日常使用的比较便宜的东西恰恰反映出当时生产关系的状况，与更多的人相关，铜器只与少部分人相关。

制陶技术不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石器晚期基本成形。

陶器作坊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支进行管理的，从铜器本身的出土来看，大约是中型贵族。

陶作坊的特点反映在产量（大量的残次品）、**组织方式的变化**（铸铜作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综合的，作容器、车马器等各种铜器都做，而殷墟时期，**制陶作坊开始走向单一化**，一个大型作坊的类型开始减少为一两种。如只做盛食器，而不做炊器。）单一化的原因是需求很大，降低成本，训练工匠也容易很多。作坊不是由一代工匠完成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知识的传递。大宗的日用品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销量非常大。

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地方类型

陶器出现之后到瓷器出现之前，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日用陶器为基础。

晚商时期，铜器的分布范围和日常陶器的差异极大。反映出文化交流的人群的区别和陶器本地化的过程。

讨论商王朝的交界——红圈和蓝圈之外，虽然还有商王朝的铜器分布，但日用陶器的分布差异与商王朝核心范围已经差异很大。目前有两种观点：（1）商王朝的核心区只有红色部分，蓝色部分是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2）红蓝两部分都是商王朝的地区，只是体现地方的分权。但至少，两部分的相同点还是比较多的，体现文化习俗上的趋同，比如是否使用商的文字系统，目前来看，蓝圈部分是可以懂商文字的。另外，丧葬制度等习俗也基本一致。

整体来看，虽然比起二里岗时期，商的范围在缩小，但其政治、军事霸权，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是加强的。

陶器特征

陶鬲越来越扁的趋向。最典型的商式鬲是 P49 第三个图，一直到春秋时期才逐渐消失。

商代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明器**。明器只是在丧葬中使用的东西，不存在于生存区。明器的特点是做得越来越简陋。明器主要都是奢侈性消费品，但做得越来越粗糙，可以看到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早商时期基本都是实用性，或不做，而晚商时期丧葬品的形式主义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这一风气，晚商社会的衰落。——西周早期，随葬品的形式主义被去掉，或者放真的奢侈品，或者不放；但西周晚期又出现粗糙而大量的明器。

殷墟的陶器分为四期，殷墟开始，陶器的分期可以和王室进行对照了。甲骨根据字形也可以进行分期，每一代贞人的字体差别很大。

白陶器，白陶始终是用来做礼器一类。晚商开始做非常精美的白陶器，仿照铜器。

青铜器特征

以酒器为中心，数量多且成套。西周时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酒器被剔除出去了，以“鼎、簋”等食器为主。商代是嗜酒的时期，而周代对酒的管控是很严的。

出现铜镜，最早的铜镜不是用来看脸的，而是用来做法的。一直到晚清时期萨满都是如此，跳舞时反光，“神”。铜镜是从西北地区出现，向中原地区传播。

“三层花纹”，晚商时期最华丽的花纹。（1）主体是兽面，（2）粗纹，（3）云雷纹填底。但不意味着晚商时期全部是三层花纹，便宜的技术依然在使用。

铭文开始普遍出现，但一般很简短，而西周时期铭文开始加长，单件最长 400 多字，组合最多 4000 多字。

还有大量外来风格的铜器，尤其是北方草原风格，双方战利品或贸易交换。参考《青铜时代：黄土高原的贸易网络》。在北方草原地区也会有很多商式铜器，反映双方很密切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并不一定是和平的。

殷墟出现了明显马拉战车的情况，一般是双马拉的，最多有六马。二里头遗存未出现。

完整的战车系统需要铜工业的配合，殷墟时期可以做到，北方草原尽管可以比较好地养马，但未必可以做很好的战车。

商文化非常流行人祭和人殉，非常普遍，西周时期完全不同。一般会保证殉人的身体是完整的，需要到另一个世界服侍墓主人，可能是逼迫或自愿。

商核心区以外的重点遗址

一般称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判定原则：是否有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与统治者的身份直接相关，西周也是如此）

苏埠屯墓地

商王陵外唯一一座四墓道大墓，使用商的丧葬习俗，作为商王方国的地方领袖，也反映商王朝对山东地区的重视程度，是商王朝重要战略区。（左传，周王否定晋侯霸主使用四墓道大墓）西周早期也将王室三公都分封到山东地区镇压原有方国，可见原有方国是商王朝很有战斗力的方国。

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群

尖底罐，不是一般的炊器，壁做的很厚，用来煮盐，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海盐量生产很大。曾经认为商王朝晚期对山西等盐场失去控制，同时也说明商王朝疯狂地加征山东盐场，商王朝的主体军队也驻扎在山东。（现在看来应该并未失去山西）

山东省南部也有发现滕州前掌大墓地，也有发现有墓道的大墓。

河南信阳罗山天湖遗址

唯一一座带墓道的墓，典型的商文化习俗。——商文化分布圈之外，尤其是“殉狗”和“殉人”的习俗是非常少的。

“息”，出气的鼻子。——天湖墓地的西北很近是今天的息县。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近五年新发现的墓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一地区在晚商政治格局的认识，曾经认为晚商失去对山西地区的控制，酒务头墓地的发现反映出对晋南地区的连续控制，连续的五座带墓道的大墓，其中三座较大，还是存在等级相对较高的晚商方国。典型商文化遗存，埋葬习俗。重要的商代封君（方国首领）的墓地。根据铭文，国家名大致叫“匿”。

西安市老牛坡遗址

最西侧，西安东郊。目前看到的典型晚商文化分布的最西界。

居址区和墓葬区都有发现，没有发现带墓道的大墓，以中层贵族为主，大型夯土建筑遗址、

车马坑的发现、葬俗的反映，腰坑殉狗、殉人，反映商文化的特征。

车马坑中经常会发现只有半个轮子，大部分情况下，轮子是木头的，车轴的地方有铜构件，发掘者现场工作时往往要挖到铜构件才会发现是车轮，进而把车找到，上半个轮子被挖掉。

这一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长，可以推到二里头时期，但不是单纯的二里头文化，

老牛坡遗址有商文化特征，同时也有西北地区的特征，代表老牛坡遗址可能处在交通枢纽。

老牛坡遗址可以体现出该地区具有自己的铜器铸造技术。晚商地区，周边地区开始得到青铜铸造技术，技术和人员的转移。发现陶器和陶窑的出现、陶范的发现，同时也出现老牛坡遗址陶器的风格与晚商相比出现变化。

推测：“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中，在商王武丁时代，涉及崇侯虎（侯虎、崇侯）的记录有 30 多条，参与商王朝的战争。——老牛坡遗址的来源。

殷墟遗址是第一个满足柴尔德文明国家的十个标准的遗存。

西周王朝的崛起与政治制度的物质表现

礼制社会的形成。

- 文献中对周人起源与发展的记述

周人大概是夹在商人群体和羌人群体之间的群体。

周人是迁徙而来，“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大致是从山西豳地向南跨过一座山一条河迁徙到这一位置。

***先周文化：**与商文化并置时期，没有成为王朝。二里头时期这一地区似乎为空白。早商时期二里岗文化向西扩展，典型遗址为周原遗存。

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克商之前，周人为主体的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

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

碾子坡文化：

有逐渐地由北向南的发展过程。但与西周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很大。

陶器形状的差异代表着器物制作方式和生产逻辑的根本性差异。

郑家坡文化：

发展方向与西周相反，先在南部出现向北，但从陶器文化上来看，与西周特点非常一致。

刘家文化：

周原遗址刘家地点，发现墓地，比西周时期早，大致在晚商时期。

陶器风格与西周不同。陶罐加双耳，反映与陇东地区的密切关系。

刘家文化大致只满足分布地点一致。

总之，没有一支能达成三个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

反思问题：陶器和族群是否一定有关系？

我们是否有必要总认为一个族群、一个政权系统就只能对应一种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反之亦然。

周人在这一地区的文化活动是由一个混合群体组成的，可能有来自原有的岐山以北邠地的人群（碾子坡），来自陇东地区的人群（刘家），来自当地原本的人群（郑家坡）。一个政权之下可能有多个族群，对应不同的陶器文化。一个族群也可能对应多个文化。

先周时期的文化发掘代表了对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反思。

*先商文化、先周文化，与上一个王朝并行的时期。

西周王朝建立的考古学反映——武王克商

《尚书·牧誓》，牧野之战。

《左传》，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几种认识：（1）商王朝的主体力量在山东地区，周人突然袭击。（2）牧誓，西部地区加周人共九个部落共同联合攻打商王朝。

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了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贵族“利”。迅速的压倒性胜利。

从物质文化和考古发掘来看，周人克商并不是简单的统治者的更替，而是统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代晚期所反映的高度宗教狂热般的国家治理手段，暴力杀戮从龙山文化开始，占卜、杀人祭祀。周人完全摒弃了商人的治理模式，开始以理性和人文化的角度治理国家，公元前 2000 到 1000 年之间。也代表着中国在未来的两千甚至三千年，到清代结束，中国的

治理模式是朝着官僚文化和理性方向进行的。没有出现过神权统治。

周人发源于关中西部范围极小的地方，面临的重大挑战——（1）如何处理庞大的商人群体；（2）如何管理东部辽阔的新领土；（3）如何长期有效维持周王室的权威性（针对卿臣（中央任职）和诸侯（地方））。

考古学物质中的一些特征反映的西周早期王朝统治策略

- （1） 大规模有意识的人口迁徙：①由东部迁向关中地区，殷商遗民和高水平手工业者；②由关中地区迁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大量出现商文化和周文化并存的情况。
- （2） 周人完全或者说基本废止人殉现象。在一些仍然以商文化为核心的据点中仍然小规模存在人殉、人祭，但规模和频率都变得很小。
- （3） 周人平民中军事人口的比例上升。墓地研究，商代军队的参与者都是以贵族为主。
- （4） 在东部新征服地区出现大量具有周人物质特征的诸侯国。
- （5） 青铜器方面，酒器比例大幅度上升，食器成为青铜器的核心。禁酒制度。
- （6） 列鼎制度逐渐形成，政治等级制度严格分级物质化。

殷遗民

依然使用典型的商物质文化传统。

- ① 商式鬲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 ② 墓葬始终存在腰坑殉狗。

成周（洛邑）遗址

西周成周城

丰镐遗址

井（xing2）叔家族墓地（姜姓），反映统治方式的变化。（姬姜联盟）

发现两座带墓道的大墓，一个人都没有杀，埋了很多车马。车马开到墓道里，直接埋入。有时是埋整车，有时把车拆开。

还有很多小型的平民墓地，少陵原墓地，大约对应一个小型村子。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都是差不多的。带戈的墓葬大约占到 20%左右，几乎可以认为 40%的男性承担军事任务。除了陶器随葬品之外，青铜器只有戈，戈是阵战型兵器，而不是近身防卫。参与国家或地方性正式军

队。晚商时期的墓葬兵器大约都集中在贵族墓葬。

周人核心区以外，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群体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地方诸侯中的殷遗民，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墓主人可能是宋国首位国君微子启，双墓道大墓，依然采用大量殉人，15人。允许少量存在，当然，对于殷墟时期来说殉人的规模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补充：考古学的材料经常只能讨论到比较大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讨论单次的事件是很困难的。比如“利簋”作为单件的器物，铭文反映出武王征商的时间、事件等。其他大致都只能反映某一王朝的物质文化变化。包括成周城的建立。

周原遗址

遗址的年代很清楚，时代从先周到西周末年。西周的垮台和遗址的废弃直接相关。聚落高峰时期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

周原遗址表明，周人实际的统治中心不在成周城，宗周城两个都城，周王更多的时间在周原遗址，大量青铜器表明，“王在周”的频率是最高的。周原遗址才是真正的王都，文献记载是有问题的。

周原遗址的区位优势是不太好的。其兴起和终结都和重大事件有关。

周原遗址内发现的遗存主要有五类比较重要的：（1）基础设施；（2）大型宫殿；（3）手工业作坊；（4）重要墓地；（5）青铜器窖藏。

先周偏晚阶段的周原

与殷墟相比微不足道，面积只有十分之一，经济和技术方面尤其差异很大，没有成规模的陶器、青铜器铸造作坊，以家庭作坊为主，青铜器只有简单的兵器，复杂的带花纹的青铜器周人是一概不会做的。

西周早期的周原

五十年的时间，面积迅速扩大成十倍。经济规模出现很大变化，石器大规模下降，出现大量手工业作坊，模式上照搬殷墟。一般认为，与西周王朝建立之后，把殷商高技术水平的手工业者大规模迁徙而来有关。

西周中晚期

西周晚期的大量青铜窖藏，与西周贵族的大规模逃亡有关，城市衰落。

基础设施建设

西周时期的城墙体系，两圈城墙系统。城圈外面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遗址区。不像以前认为周原遗址没有城墙。西周早期应该已经开始兴建。

人工地渠系统，形成水网系统。在城市内为了供水或交通。从西周早期开始建，反映城市大规模扩展之后的情况，一直到西周中晚期才废除掉。殷墟时期开始，人工有意识地修建大规模水渠，并不是西周首创，照搬、模拟了殷墟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周人也不只在周原这样做，至少在丰镐遗址也有类似做法。与二里头等的陶排水管道已经很不一样，最多只能作为集水和排水，不能作为运输，而且无法为大规模城市供水。周原遗址隔一段有较大池塘，水渠窄的地方有 3、4 米，宽处有 5、6 米，可以进行小型运输，供水量也很大，与城市人口大规模增长有关。另外，发现水渠穿过重要手工业生产区，铸铜、制陶等，原料加工、烧制，包括后期清洗。——生活用水、工业用水。

*良渚水渠，拿自然河道改造水渠。

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变化：“**战国之前**，不重视经济或生产要素，基本城市是一个大型的宗教设施，**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如大型祭坛等作为中心”等类似看法，依据以殷墟为基础的发掘，主要是宫殿区、王陵区等，2000 年之前殷墟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发现不够，对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方式也不清楚。与发掘者的工作重点有关。目前的工作发现，殷墟、周原等大城市在城市规划时是对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很重视，对手工业生产的运行和保护也同样很重视。

建筑基址

周原大型宫殿建筑群，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三处，凤雏、召陈、云塘-齐镇。

往往不是一座建筑，而是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三个地点的建筑风格差异很大，可能和功能、等级、年代有关。

凤雏地点

凤雏甲组和凤雏 F3。

凤雏甲组建筑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典型多进式院落。保存完整。

- (1) 门口有影壁。根据文献说法，天子会把影壁放在院落外面，其他会放在内部。有学者根据“外屏”认为这个建筑的使用者是周王本身。（中南海是内屏）。

(2) 凤雏甲骨坑出土大量甲骨，大部分是西周早期，内容在逻辑上往往很不正常。

(3) 关于建筑年代，基本认定为西周早期建设，在西周中晚期停止使用。

过去一般认为这是天子的居所或办理政务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并排的乙组建筑。

凤雏甲骨，体型上和殷墟的甲骨不太一样，多为龟甲，字体及其细小，记录了祭祀、战事、与邻国交往等重要国事。但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内容中出现了很多商王的名字，记录对一些重要商王，如“成唐”（成汤）、“大甲”、“武丁”等商王的祭祀。而且把周的统治者称为“周方国”。有些人认为，这里是一些殷民高级贵族的居所，被周人所允许。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先周遗址，周人还是方国统治者。

*甲骨坑也可以和建筑不同时，作为重要档案保存得比较久。

凤雏 F3 的发掘更替掉了此前对凤雏甲组的所有假说，是目前在周原遗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建筑。

车的范线没有打磨掉，可能没有使用几次，作为献祭品被埋在 F3。大型宗教区。

召陈建筑群

单体建筑，没有围成院落。年代比凤雏较晚，西周中期才开始建设。周原建筑的功能几乎没有能说清楚的，每一个都不太一样，没有证据。

召陈 F3：殷墟建筑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没有形成柱网。礲墩，挖一个大坑，填入非常多小石头，大幅增大柱础。有学者认为 F3 可能是后人所说的“明堂”。（儒学家对西周礼制的想象。）

周原遗址发现的瓦片非常多，有些瓦带有非常复杂的装饰。

散水：在预计屋檐水滴下落的位置铺上石头子，防止水滴石穿成为沟渠。好处是屋檐形状基本可以根据“散水”勾勒出来。

云塘-齐镇建筑群（云塘）

城市的中心区，一个一个单独的院子，品字形院墙，每个院子之间一个主殿两个厢房。建筑模式又与前两个不同。更多的学者认为是一个高级贵族的居所，正常的三合院结构。少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庙，一个挨一个。年代偏晚，基本是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重要做法，散水铺得很细致。

周原的居民

先周到西周时期有明显不同。先周时期以西土人为主，西周时期，人口规模开始增大，大量殷遗民进入周原。（1）高级贵族，尤其是特别高级的贵族，商王朝时期到西周时期一直是王朝高级贵族；（2）手工业作坊的工匠。

高级贵族

青铜器铭文直言自己的身份。中型高级墓葬，腰坑殉狗习惯，也出土少量青铜器，有铭文。

周原墓葬系统

（1） 独立、纯净的墓地，与居址区分开；周人的墓地，南北向为主，腰坑很少。

（2） 居葬合一；地点主要在手工业作坊区。管理者可能是周人，但大多工人可能是殷遗民，特殊的東西向墓葬，腰坑比例很高，但不会是百分之百，比如通婚、财力等。

两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习俗。周人还是很看重手工业工匠，地位不会很低。周原发现的带墓道的墓葬很少，只发现了一座，只发现了埋车，没有埋人。可以看出王畿内部的高级贵族不允许殉人。

周原手工业的总体特点

周原手工业作坊的出现与殷遗民与大规模手工业能力的转移有关。涉及到技术知识的扩散、组织管理方式的扩散、熟练人员的扩散。周人对商人手工业工匠非常重视。

《尚书 酒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周人禁酒，但如果是殷人工匠沉迷喝酒，不要杀他们，劝诫就好了。

不同作坊之间是协作关系，单个作坊尤其是大型作坊是活不下去的。

制骨作坊，骨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代替今天的塑料，非金属制、有一定的弹性、重量偏轻。制骨作坊是二次消耗，人不会为了制骨作坊来宰牛，大型城市宰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主要是为了吃。反映城市主要肉类供给系统发生了变化，不可能是自家杀自家的牛，靠外界构拟，统一的屠宰场。动物资源产业链。

制骨作坊大量使用金属工具进行加工，需要铸铜作坊不断地提供工具，废锯也在回收重熔。体现了不同作坊之间的产业联合。

作坊的功能很单一，做簪子。平民的发簪使用量也不小，一个普通人家的女性在下葬过程中

当天就使用了 11 根簪子，是易耗品。因此骨簪的消耗量很大。

“非生存性的社会必需品”，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身外之物”。消耗了很多产能。

两个骨头之间的差值是固定值的固定倍数，标准化生产，对大规模生产是很关键的。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对于监管者来说，提高监管效率，绩效。

铸铜作坊

庄李铸铜作坊，西周早期开始建，贯穿整个西周时期。

关中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很多都能在庄李铸铜作坊发现铸造的陶范或模。

西周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青铜器铸造风格非常一致。极有可能依然维持着中央政府掌控核心青铜器生产能力，地方不掌握。春秋中期开始普遍，早期开始这种现象，地方诸侯国开始获得了非常精湛的青铜器铸造能力。

周原青铜器窖藏

周原最著名类型的遗存，目前看到中国所有遗址中以窖藏形式发现青铜器最多的。

- (1) 大部分年代偏晚，时间集中，西周晚期；
- (2) 器物往往成套出现，长篇铭文，显示一套青铜器往往属于同一家族。
- (3) 往往分布在大型建筑附近，离贵族居所不远。
- (4) 有意识地挖坑，放在里面整整齐齐地埋好。
- (5) 一般认为，青铜窖藏的形成与西周的衰亡有关，贵族逃走之后埋藏。

里面的铜器未必都是西周晚期的，里面的铜器年代差别较大。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变化——礼制社会的表现

- (1)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风格、类型等与商代晚期差不多，工匠很难在短时间内无法更新技术；
- (2) 西周中期发生根本性变化，酒器（觚、爵）丧失掉其礼器的核心部分，由酒器转移到食器。鼎、簋的数量疯狂增加。（西周的酒自己不喝，但可以用来敬神，把最高级的酒叫做“玄酒”，有些学者认为是清水。）
- (3) 青铜器的装饰风格改变，商代晚期费时费力的三层花纹退出，纹饰更加抽象，“龙纹变体”，几何纹；
- (4) 铭文长度不断增加，写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早期还以赏赐铭文为主，西周中晚期出

现了更多社会生活内容，如双方打官司，土地交易契约，个人政治理想或抱负，对社会的政治认识，有学者称为文学的开始。

庄白一号窖藏，单体青铜器发现数量最大。家族的所有者明确，铭文很长，“微氏”家族，担任王室的史官。记载王室做了什么，“史”要会写很多很漂亮的字，负责王室重大活动中周王的副手，向地方诸侯大臣带去指令，起草王室诏令。世官制。（地方诸侯是世袭制，中央是世官制，官职层级一致。）

“墙盘”，投奔周人的殷商人，文王时期就加入周人群体，周公把他们家族分封在周原。被认为铭文中字写的最漂亮的。一代家族首领辅佐一代周王。

赏赐铭文，大部分涉及到官职的任命。

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

杨家村是大型采邑，一组青铜器的铭文总长度大约 4800 字。

分封给自己原本的西土人。

列鼎制度

是比较早提出来的，文献中也有提到，“天子九鼎……”。

鼎簋是核心器物，鼎逐渐变小，簋大小一致。

列器制度其实从殷商时代就开始了，西周时期开始成熟，直接将数量和身份挂钩，“能吃几个菜”。杨家村窖藏出现之后，发现“天子九鼎”是后来理想化的产物。

杨家村窖藏没有奇数件，其中有一套甚至是 10 件，而且根据大小变化不均匀，认为至少缺了一两件，与文献记载有偏差。

以前认为列鼎制度在东周较多，诸侯僭越出现较多。但西周时期的发现可以看出后世文献的记载可能存在问题。

柞伯簋，河南出土，与周王的统治有关。周王组织体育活动，贵族礼法与社交。这一簋的底座是后加的，类似奖杯。各地诸侯定期也需要去到周原，维持王室与地方的亲密关系和王室稳定。《左传》中会经常出现诸侯不来朝见周王的问题，不只是供奉财物的问题。

西周中晚期，铭文又发生重大变化，西周窖藏开始出现不正常的铭文，不再记载国家安定祥和，民事纠纷不再仅仅依据地位，国家出现法制。

赏赐铭文是主体，到东周时期发生了变化。很多事情不再依靠宗法礼制来维持，需要理性的法律来解决。民事纠纷案件。

周原董家窖藏

微氏家族是做史官、王室贴身秘书的高级贵族。而董家窖藏的主人家族是中级贵族，管理王朝的手工业作坊。

西周中晚期，大量土地开始私有，卫盂记载了一桩贵族间的土地交易。双方用贝币算好数量，再进行交易。

法律判决书，向王朝官员状告，王朝官员通过法律进行判决。虽然判决并不公平，但证明下级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状告有可能存在问题的上级，证明有法律。记录通过财物减免鞭刑。

五祀卫鼎，某位王的第五年。周王指派的工作修建水利，个人的私有土地被占有，打官司寻求赔偿。“井伯”等五个人是周原的城市管理体系，判王朝官员败诉，需要赔付土地。“司土、司马、司工”，管理王朝手工业体系的人。理性的对于私有财产的认可和赔偿。

窖藏中器物的铸造时间不一致，但埋藏的时间却相当一致。

西周王畿地区，包括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两个盆地。东部的广大领土都是由诸侯国受分封的。王畿两边有大型采邑（不称为封国，采邑的首领是领主），往往属于一个家族。（“周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爵位，时间持续特别长，到东周，周王室灭亡时依旧存在）

周王朝将王畿地区把关中平原分成几块，变为王室大臣的采邑。虽然土地面积不大，但是离王畿很近，所以地位很高。采邑的核心区面积都不大，低于 5 平方公里。

周公庙遗址，四墓道的墓，虽然规模小一些，但墓道的结构还在，历代周公的墓葬。刻辞甲骨，带有王的名字和周公名字，占卜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周原具有非常强大的手工业能力，但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下放。

采邑只支撑豪华的生活，但不支持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以散氏家族的采邑杨家村来说，可能更多的作为一个农业据点。采邑，农牧业而不是手工业。

东周王畿的考古发现

东周时期考古遗存的总体特点

各地考古学物质文化的差异性增大，即各地开始出现强大的独立的手工业制品的生产能力。城市高速发展。

礼制文化开始出现僭越和扩张的表现。表现在鼎的数量非常夸张，诸侯国和士大夫的鼎的数量会比自己的阶位高很多。

青铜器铸造技术改变，用途和形制发生变化。功能从礼制逐渐变成钱本身。

铁器制造，成为手工业的核心部门。

东周的小诸侯国往往要把墓葬放到城内，只有大型诸侯国齐、楚、秦才敢把墓葬放到城外。在作战时通常要掘开墓葬以刺激出战。

东周时期虽然王室在衰落，但社会本身在发展。还是比西周时期的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

“天子驾六”，一组六匹马拉的车，根据战国到汉代的文献记载，“天子驾六”，判定为周王陵墓的陪葬品。“天子驾六”博物馆。

王室衰落，墓葬形式、鼎的数量做够，但从精美程度、器物体型都和西周相比差距很大。

错金，物理方式，开槽子，把金丝敲进去，再用其他的工具把金丝修平打磨。错金是比较早的技术。

鎏金，用汞的置换方法，把黄金涂抹到器物之上。

东周陶器分期（具体不用记），后面的器物断代基本都是以这个分期为准的，形成一个标准。

周原地区在东周的年代标尺。（王畿地区）

洛阳市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

两周时期诸侯国的成长和重组

由北到南顺时针方向转一圈。近支都是在黄河流域。

周王室近支：晋、郑

西周时期女性高级贵族的墓葬玉器要多很多，但没有兵器。尤其是项链，墓主人的胸前，挂在身上。玉覆面。金缕玉衣。

组玉佩整个的长度达到了两米，非常重。只能是礼仪性或典礼性的佩戴，或者生前不佩戴。

北赵晋侯墓地（主要）；羊舌晋侯墓地；

羊舌晋侯墓地，双墓道大墓，位阶比较高。

埋人，有些是被处死的。与晋国参与王室的斗争，以及晋国本身的内乱有关。

晋都新田遗址

目前看到东周时期晋国比较长时间使用的遗址。大城是品字形，周遍还有一些小城，一般解释为卿臣的所属地。

侯马盟誓遗址，不埋人，以牛马羊为主，没有埋猪的。动物的上面还要放一些石片或玉篇，上面要写字，称为“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赵氏家族的内部斗争。山西一派斗争邯郸一派。发誓的内容就是跟我这一派在一起反对谁，不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大部分的盟辞说完之后最常见的咒语是“麻夷非是”。

温县盟书，大概就是两派对抗的内容。

把祭祀活动变为政治联盟的场所。进行祭祀的过程中同时要求大家进行盟誓，站在盟主的一边。

侯马铸铜作坊

工匠对于模范法的使用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侯马铸铜作坊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标准化铸币情况。春秋时期的铸铜作坊在春秋时期只发现了四处，其中晋国是最大的。显示着晋国在这一时期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在经济、货币体系上还有明显优势。

春秋晚期，晋国卿臣开始崛起，国君的权威开始下降。

太原赵卿墓

墓主人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赵氏家族的首领。

列鼎数量应该和身份成正比，但经常有超过理想制度的情况。

青铜器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旅行装备。

赵都邯郸

赵国的都城也形成了三个城圈围起来的“品”字形。

赵都邯郸北部是赵国的王陵区，放在了城外。战国时代国君的墓葬发生变化，早期“不封不戍”，东周之后尤其到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开始为自己修建非常庞大的王陵，依山而建，削出平面之后，再人为建造“封土堆”。上面还建造一些房屋，证据是可见散水和铺地云纹砖。

魏国都城原本在山西省南部地区，后来迁都到大梁。整体来说魏国的考古做的比较少。

郑韩故城

郑国一直处于一种左右横跳的状态，一面依附晋国、一面依附楚国。在器物遗存上也有所反映。

利用水系来保护城墙，双洎河（洧水）、黄水河，淮河的支流。

东城，普通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西城，宫殿区。

春秋以前手工业作坊大多在宫殿区附近，而战国时期把宫殿区和作坊区分开，作坊区全部集中在东部，大型生产和宫殿分开。

郑国是小国，王陵在城内；（后来韩国的王陵在城外，一方面实力更强，另一方面战国后来的陵墓形制要起封土，不太适合放在城内。）

莲鹤方壶：反映出郑国受到了南北两边霸主的影响。莲鹤方壶器物的主题就是壶，和西周晚期庄白一号窖藏的壶差不多，上面又加了繁复的装饰。“莲瓣”是晋国非常喜欢做的，而细节上的“小老虎”装饰，“吐舌头的龙”，是典型的楚文化风格。



青铜，楚式吐舌头的镇墓兽。

*郑国的国君作储君时不一定会送到晋国还是楚国作人质。在哪个国家长大的公子往往要认为这个国家比对方强大得多。

车马坑，车马数量很多，且车马混合着埋。车马坑的所有者应该还是比较高等级的贵族，象牙做的车踵。作为车的构件，也作为装饰。

新郑祭祀遗址: 在城内多个地点都有发现,靠近郑国原来宫殿区。有的坑规规矩矩地放铜器,青铜礼器、乐器,没有其他实用工具。有些是埋成套的马。和西周周原贵族逃离时的窖藏坑不同,包括实用物品,把家里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埋进去了。坑一个挨着一个,不是零散的。包括连着乐器的架子一块儿放进去。因此,一般认为是祭祀遗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列鼎制度一方面更加完备,另一方面僭越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郑国国君其实没有称王,已经超越自己的等级使用青铜器。要么是礼记中的制度不合适,要么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僭越是十分严重的。

韩王陵

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城外,其中有一些之前做过发掘或勘探,四座东西并列的大墓,往往是一位韩王配着一位夫人埋在这里。

南水北调工程,绕道韩王陵,同时做了发掘工作。

战国时期王墓的面积和施工量比起春秋时期要大得多。

两周时期的诸侯国：燕齐鲁

东海和渤海之滨,三个国家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西周时期的始封年代都是相似的,都是西周建立初期就受封。西周初期功劳最大的三位卿臣都放在王朝的最东边。齐国,太公望;燕召公、鲁周公,姬姓自己的人。(第一代周公旦和召公奭其实都没有来过封地,两个儿子各自继承中央的官位和地方的封地)

燕国

西周铭文“匱”,召公奭的封国。燕国离中央最远,和当地人混居(类似殖民),涉及到不断地迁都(迁移据点)。

琉璃河遗址

高等级墓葬,燕国第一代国君始封的地点,发现王城城墙。西周的大部分诸侯国都是扁的,后来逐渐变方正。



令克侯于匭。

大规模、有意识、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很多人口向各个诸侯国进行分发。墓葬分为两群，一群是典型的殷遗民的墓葬，一群是周人墓葬，生活上可能在一块儿，但墓葬是有隔离的。

大兽面、明媚的花纹，大多都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从风格来说，这些器物 and 周原、成周城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没有区别，极可能这些青铜器的制造不是在燕国完成的，西周中央政府对大型青铜礼器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

燕下都遗址

燕下都遗址是战国都城面积里最大的一个，西城除了一些墓葬和小型的据点之外比较空荡，遗存基本都集中在东城。有可能西城刚建好不久没有用，没有人口填；也可能西城只是临时的军事据点。

战国时期宫殿建筑的形制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高台建筑，人不再满足于平地上的大型宫殿。但柱子的直径是有限的，特别高的只能建塔，但直径又很小。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住的很高但是实际上中间垒的土芯，可用面积很小）

宫殿上繁复的装饰品，精美的建筑构件。重型的瓦需要扣瓦钉固定在房顶上。带有精美装饰的瓦当，浮雕墙砖。整个建筑的精美程度有了一个飞跃。

典型战国墓葬，封土堆。但具体的身份不确定，应该认为是王室成员，但哪一座是王墓不确定。出土大量陶礼器。一直争论的问题是，（1）在燕国的国力受损又不得不维持等级降低材质？（2）其实繁复的陶礼器也很难做。其他国家即使是在亡国灭种的时期可能也主要是铜。燕国的经济状况确实在恶化，燕国铜币的含铅量是最高的。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齐国

山东省北部是齐国墓地，南部是鲁国墓地。

齐国在春秋、战国都是毫无疑问的大国。很多代周王的王后都是姜姓，同姓不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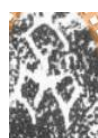
临淄作为齐国都城是比较偏晚的事情，西周时期齐国的都城不在临淄，初都营丘（不确定具体位置），后来搬到蒲姑。到第七代齐献公才将都城迁到临淄。大多数都在山东北部。

田氏代齐。

高青陈庄遗址

城圈的面积很小，外面是否再有城圈不太清楚，但确实发现了非常高等级的夯土台阶（明显是个祭台），发现单墓道大墓，随葬的车马坑。年代是西周早中期，应该还是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的形式是典型的西周葬式，没有腰坑，车放在前面。

多件器物的铭文中有“齐公”字样，“祖甲”就是“齐公”。制作器物的人是“丰”，应该是齐公的后代。可能是西周早中期的重要据点，



三个箭头一块向前走是“齐”。

临淄齐故城

一般认为先有大城，是春秋时期建的，小城是后期建的，有人认为是田齐时期建的。城市从东北角往外扩，先有西周时期的居住圈。

临淄齐故城的发掘量很大。更大系统的排水渠道，其中很多在城墙下面压着。

城内依旧是高台式建筑。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当地最大的台子是桓公台，典型战国时期的高台建筑。

刀币的铸币作坊放在宫廷内部，离王宫最近的地方。

春秋到战国时期齐国的墓葬形制发生了变化，殉人的情况到战国时期倒退，齐国、秦国，楚国也有一些，发生了殉人的情况，非姬姓的国家。战国公子死后门客主动殉葬。一般都是大型墓葬才会有，殉葬的人也是有一定身份等级的，下葬时也有自己的棺，穿着很好，佩戴武器、饰品。

临淄车马坑，发现的姜齐时期的陵墓比较少，还都在城内的东北角地区。

齐景公墓殉马坑，目前看到的埋马最多的坑，但没有发现车。齐国强大军事力量的象征。

鲁国

鲁国早期的据点根据文献反映，中心据点一直没有变化，都是曲阜。曲阜的考古工作比较难做，曲阜受到历代君王的重视，做了很多祭祀孔子的建筑。

孔子认为自己是商人的后代，但认同西周的礼制。最早的周族人和商族人都在同一地区。

春秋中晚期开始，在中国的广大地区青铜器开始和东周王畿地区发生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燕、齐、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内部差异比较小，货币等方面也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都以刀币为主，燕国也使用一定的布币。西周中晚期全国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到战国中后期又开始统一。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时代

公元前 2000 年开始，讲到东周时期。二里头到商时期还属于本地特色比较强的时期，还没有融入到中原文化圈（商），存在一个由非中原地区到中原文化圈转换的过程。

进入后石家河文化（BC2200~BC1800），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数量和聚落等级都会下降很多，没有大型墓葬和建筑。发现过零星的有可能出现铜制品的冶铜情况，但很少。屈家岭遗址出现过炼渣，含铜量很高。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差别明显，有大量来自于中原地区（主要是淮河流域）的陶器开始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

商代之前（BC2200~BC1600），考古学遗存的发现数量很少，在石家河文化结束后，夏时期，该地区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各地区的发展不是同步向前的，经常出现倒退的情况）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向南移动，以盘龙城（武汉市）遗址为中心，但和中原地区二里头陶器的样子并不完全一样只是相似。有学者认为是学习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有学者认为是中原地区的人向南移。

荆南寺文化

明确的开始，江汉之间的区域，以湖北江陵为中心，早商到中商地区。

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有共同特点，陶器风格越来越本地化，铜器风格越来越中原化。

主要炊器是鼎（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是鼎，进入早商用鬲），少量出现了商文化风格的鬲。发现了一些零散的铜器。

这一时期洞庭湖应该比今天大得多，根据古地理和古气候的还原，原本应该是云梦泽一个大湖，遗址其实是沿湖分布的。

周梁玉桥文化

湖北沙市，分布范围大致与荆南寺文化相同。基本认为是延续，同一个人群的演变。

以鼎为主，鬲越来越少（晚商风格），约相当于晚商并延续至西周。

发现与商文化相似的用龟甲占卜的情况，没有字，可能存在占卜习俗。

铜器的形制与中原很像，但纹饰风格本地化，可能是本地制造。

石门皂市类商代遗存（宝塔文化） 还没有明确命名

澧水流域。石门皂市遗址，地层比较清楚地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商代、东周时期的人类活动三层。

从早商时期开始出现，持续到商结束。

炊器是鼎和釜，很少用鬲（商式鬲）。

目前没有发现明显大型铜器，只有中小型，铜器还是典型的商式风格。

对门山-费家河类商代遗存（炭河里文化）

没有明确命名，在一定区域内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重复性的文化，有广泛的文化物质表象上的相似性。不排除偶尔的变化。

大致相当于晚商时期，早商时期也有少量的人类活动。

炊器以鼎为主要炊器，鬲与中原差异较大。

发现大量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湖南省中南部地区。四羊方尊。炭河里遗址，有城墙，比较大，年代大约在晚商到西周时期，青铜器风格也非常像晚商时期青铜器的风格。有学者开始改变对该遗存的称呼，炭河里遗址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学者开始称“炭河里文化”。

人面方鼎（大禾鼎），该器物的本体与商代晚期鼎形制相似（三层花纹），不看人面。

还出现了一些当地特色的南方式青铜器，甗，最早模仿的应该是竹簍子，纹饰也是几何方格纹，像交错的竹编。铙（乐器），倒过来类似编钟，下面有柄，长江中下游地区非常喜欢铙，有时会出现编铙的情况，一大组。

与晚商地区的器类很相似，但使用相似的器物来做不同的事，如非常喜欢用中原地区的酒器作储藏器用。（放置玉器、小件的青铜器、贝壳）

吴城文化

以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吴城遗址命名。商代考古学文化。

年代基本是二里岗上层时期。早商文化的偏晚时期持续到商文化结束。

陶器群：与湖北、湖南地区相似，一定程度的商文化影响，后来本地化风格越来越强。始终是以鬲作炊器，开始还比较商式，后来越来越扁，商文化本地化的过程。

吴城文化发现非常多的青铜器。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没有画出平面图，分布是由发掘者口述和回忆。有棺槨的大墓，没有看到墓道或看不出来了。槨是不动的，棺是可以移动的。出土器物很多，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包括相当比例的**原始瓷和硬陶，长江中下游技术**）。

铜器风格极富特点，商文化特征总体形态，高质量（技术水平和艺术性），本地风格的装饰改造。墓葬铜器持续时代较长。特殊的玉器，与中原地区玉的材质不同。最早的水晶器（硬、脆），比玉的加工要难。本地风格的铜器、商式风格的铜器，产地不明，不知道是不是商式铜器就是中原地区生产的。习惯改装商式风格的青铜器，加小动物。在原来的青铜器上焊接或切割，拿到的是完整的鼎，改造是后来的。乐器，铙。

兵器制造，青铜兵器非常精致，镂空镶嵌（绿松石）。

本地风格，大型动物造型或人面造型。两面一样，两个面具扣在一起焊接，下面是空的，可能是旗帜靠近顶部的东西。该器物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都很喜欢做人面。中原地区有时用小人作配件，主要装饰中心还是兽面或饕餮纹。虎形器，很大，虎鸟配合。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器物都是先铸造好，再做改装装饰。

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

（湖北省铜绿山铜矿，另外一个重要的铜矿点）

与吴城文化并行，二里岗到西周时期都有，保存很好。人工矿井，通过木架子搭巷道，早期通过铜草花发现浅层铜矿。

商代晚期当地挖矿的技术已经较高，开始采深井矿，木质结构的采矿巷道。从晚商到战国巷道搭建方式一直在改。

矿井的年代不好判断，沿用很多年，不断反复。该铜矿的开采量在商周时期是非常大的。商周时期在铜绿山和铜岭铜矿的争夺是很严重的，战争。

溜槽选矿，用水冲，留下矿石。

以上几个是商时期的文化。

楚

楚的兴起，西周早期开始有影子。

楚在整个西周时期的发现很少，存在从晚商到西周晚期的很大缺环。文献线索，楚在西周早

期和周人有一定关系，“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楚作为自己不愿臣服的理由提出来，不一定可信。

西周中期开始，楚成为周王室公开的敌人。武汉话“不服周”。

湖北宜昌万福垭遗址

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一组编钟，本地发现的带“楚”字铭文的青铜器，表明楚国成为比较强大的政治体系。表明楚的政治中心已经在长江沿岸。

西周王室与楚国有密切关系，也有可能是敌对的关系，楚钟出现在王室中心和重臣的墓中，可能是编钟打散，战争中俘获的东西，封赏。

东周时期，楚曾多次迁都，初在丹阳（位置不详），后到郢都，纪南城遗址，到白起攻陷郢都为止。

楚国不管迁到哪儿，所有的都城都叫“郢”，后世历史学为了区分会加一个字。

楚郢都纪南城遗址

位于荆州城北 5 公里，纪山之南。带水门的城市。

以前认为城墙建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延用至战国。但城里的东西不一定是战国时期的，可能先有人住，而后才建城墙。

楚王居住区可能在东南。

墓葬主要集中在城外的一些山头上面。

东周时期南方城市的特点，水道。

东周时期的楚国墓葬，平面形状都和北方带墓道大墓一样，楚墓的墓口都特别大，（秦墓要更加夸张），可能跟地质有关，南方地下水很高，挖台阶，墓室其实已经没有多大了。熊家冢应该是多代楚王的埋葬点。

熊家冢楚王墓，殉葬坑和车马坑。大量殉人。非姬姓国家开始恢复殉葬制度。

随葬坑，车马坑拉的很长，车的排列整齐。（车上很少有铜构件，作为机械活动的东西在关键地方确实需要铜构件，而熊家冢基本是纯木质的，而采用大量漆装的方法。熊家冢车马坑的车是否是实用的，还是仅仅用来随葬，如果长期使用功能可能很快磨坏）

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楚王主江汉，范围后来一直扩张，后来占据整个长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向南的分布也很大。

楚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政治国界。楚国地域与两周诸侯国不同，农业、南方矿产等。

楚地盛行巫文化，民间风俗、精神信仰，神鬼升仙思想很重，体现在楚的各种物质文化，包括屈原的文学作品。

楚国保守性遗址很多，可以挖到很多和中原不一样的。——屈原可能是“现实主义”，屈原所写的都是他生活中见到的，或实际使用的东西。

（补笔记）

曾国与楚文化

曾国和随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相关研究已经解决，曾和随就是一个国家。曾国是典型的周系国家，封君是姬姓的，南宫适。

叶家山墓地完全是周系的，墓葬形态也是中原系的。

楚地的情况是在槨的外面再搭四个厢，把随葬品放在里面。到文峰塔墓地已经使用楚墓的习惯。青铜器的铭文也反映曾已经与楚成为盟友。

周人应该是维持对铜绿山铜矿的控制权，在南部区域分封了很多国家，但到东周时期周王基本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管控。

很多楚文化的重要案例都是来自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的编钟是楚王送给他的。楚王曾经到曾国避难，曾国非常好地保护了楚王。

漆器，保守环境会出比较多的漆器。

梳妆匣，封君（男性，领兵打仗）。乐器，不同类型，瑟、琴、鼓（两鸟两虎）。

特殊漆器，楚式镇墓兽，非常有艺术性，夸张。主体一般是吐着舌头的大怪兽。鹤的翅膀一般用麋鹿的鹿角。河南信阳地区长期在楚国范围内。镇墓兽是典型的楚国的习惯。

楚国青铜器注重细节，精细，大量镂空。失蜡法，区别于模范法。比较快速的形成复杂铜器。

但失蜡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模范法退出了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整个中国铜钱的铸造都是用模范法。超大型青铜器也不适合失蜡法。失蜡法一般用来做比较精巧的东西。新技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技术的退出。

楚国是掌握失蜡法比较早的国家，但失蜡法如何出现在中国还存疑。

墓葬习俗，随葬大量的兵器，质量好、数量大、奢华。青铜剑，吸收吴越地区，吴越剑。

长江下游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

夏商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总体特征

良渚时期，高度发达，远超其他地区。

总体来看，夏时期到商时期炊器主要以鼎和釜为主（整个长江流域，只有少数文化区如吴城文化用鬲），生活习惯由鼎到鬲应该是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与中原地区接触。

青铜器出现较少，即使出现也是小型工具。

原有的玉器传统基本消失，以前的良渚玉琮等已经没有踪迹。

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开始出现。源头不太清楚，大致判断是闽、浙、赣、皖的交界地区。原始瓷逐渐精细化，发展成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瓷器。——**当地人重要的技术探索**

目前没有发现大型中心性遗址，社会分散化状态，没有出现重新聚集、重组之后的情况。（良渚之后）

三支主要的考古学文化

马桥文化

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时期到早商时期（应该说是夏时期到早商时期比较合适，是以以前的“二里头时期”）。

没有明显的青铜器出现，小型、简单的兵器和工具，目前没有发现相关冶铸的东西。

大部分陶器是素面为主，主要的炊器是鼎，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三足器，鬲、甗（yan3，拿鼎改造）。炊器不用空三足器，鬲非常少。

***鸭型壶（偏嘴带把）**，长江中下游地区非常常见。发现了一件上釉的原始瓷的鸭型壶，早期的釉不太好，脱落会比较严重。

马桥文化遗址点在当时已经是在海边了，虽然现在随着海岸线的变化靠近内陆。

点将台文化

年代大致相当于夏时期，点将台文化还没有出现原始瓷。

湖熟文化

大约相当于整个商代。

开始以鬲为主要炊器，鼎的数量开始减少，明显表现出人群生活习惯的变化，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不一定表明人群的替代，只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生活习惯发生改变）

在马桥文化没有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前提下，湖熟文化商时期受到外来影响。

当地开始出现少量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

铜器开始出现，出土晚商时期的铙，典型商文化的纹饰风格，当地自己青铜器的风格还没有产生。纹饰与湖南出土的铙非常像，流行乐器。

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

零散的发现，比较混乱，很难理出体系。也许证明当时没有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集中体和共同生活网络。

百越地区（战国时期才出现这一名称），“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分散小型族群居住。

黄瓜山文化

闽江下游地区，靠近福州市，沿海地区。

从遗址类型来看，很大一部分是贝丘（贝壳的小山）。黄瓜山文化基本没有种稻子，都是狩猎采集，不太涉及农业。

陶器大部分都是圜底器，连三足器都很少。彩陶，延续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特点，和以前中原地区相比比较精细。黑衣陶，表面烧制，有学者认为是发展到原始瓷的中间阶段。（带衣、上釉、瓷器）

黄土仑文化

陶器和原始瓷、印纹硬陶的差别主要是敲击时的声音，瓷器比较硬，叮叮当当。

没有三足器，始终以圈足器为主。

仅有非常零星的小型铜制品。

墓葬总体的体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黄瓜山和黄土仑主要在福建的北部地区，夏时期到商晚期差不多可以接续。

浮滨文化

遗存发现比较早，1930 年代，位于粤东和闽南地区。

年代大约是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少量进入西周时期。

圜底大口尊是浮滨文化代表性器物，储藏器。也有一部分鸭型壶。

铜铃、小型青铜器，和北方地区有明显接触。当地青铜器制作从中原江淮地区传入。石制牙璋，说明和北方区域有接触，当地开始模拟地做一些牙璋。

***原始瓷和印纹硬陶**

二者的主要胎体差不多，各地不同。主要是高岭土为主，但当时不算特别纯，有杂质，胎体摔碎一般都发黄。还有人认为胎体是把石头磨成粉再与土混合，但总之与一般的陶器不同。更主要是烧制温度的差别，胎体很厚。

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主要差别是表面没有上釉，但质地很硬。原始瓷上石灰釉，纯度不够高，颜色还比较灰。

吴越文化（两周尤其是东周时期）

吴越两国敌对关系非常强烈，但物质遗存高度相似。相敌对的政治势力并不意味着物质依存有明显差别，相反，恰恰从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生活地域等，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分不出来的。（物质文化不同，但也有可能属于同一个政治体，如先周文化，多个部落的混合体）吴人，“太伯奔吴”，与北方国家如晋（成王兄弟、武王儿子）、齐进行外交活动时的说法，为了追求分封更早，外交的优越地位。越国人说自己的祖先是禹的后代，“禹之苗裔”。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线索

虽然未必能证明真的是太伯，吴国的说法，但是还是能说明该地的文化是延续的。

吴越一般要混着讲，因为分不出来。

土墩墓，这种墓葬形态在长江下游一带很多。江南地区的土墩墓与南方的环境有关，向下挖不太现实，地下水位比较高。就干脆盖在上面。比较早的土墩墓不是说一个墩子一个人，可能下面有好几个人。中心可能有一个大墓，随葬品很多，中小型墓可能呈现出一种向心的状态，有人认为是随葬。土墩子有一些是不断往上贴，不断扩大，可能挖出的墓年代有一定差距。

春秋晚期之后，当地的土墩墓发生变化，吴越地区和楚地接触比较多，开始学会了向下挖的方法，下面把中原地区的中字形（甲字形）带墓道的大墓照搬过来，但上面还是要盖一个土墩子。

土墩墓青铜器，（1）典型中原风格青铜器，铭文；（2）仿制中原青铜器，很多细节如纹饰风格显示应该是当地做的；（3）当地特有类型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

西周中原地区的原始瓷都偏绿，长江下游地区南方的原始瓷偏黄。

土墩墓什么时期出现，分布在哪里目前来看还不太清楚，闽浙赣交界点比较多，和原始瓷的分布也有比较大的相关性。

福建浦城管九土墩墓群

年代持续时间特别长，最早到公元前 2000 多年，测年有到 2600（但不太可能，木炭有老炭的问题），但说明有早到夏时代。

典型来自中原地区的，双耳杯；有些仿制，基本完全一样，青铜盘。反映闽浙赣交界这一区域应该是吴越地区人早期的分布地区，而且与中原地区有一些联系。

江苏丹徒烟墩山 M1

出土一批典型西周青铜器，还有本地仿制的西周青铜器。

宜侯矢（ze4）簋，出现了周王的名号。铭文记载了周王改封虞侯为侯的事，有学者认为“虞侯”就是“吴侯”，周王分封，但当时周王是否真的能控制这一地区需要怀疑。

吴王余昧。（日末）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风格，年代偏晚，发现吴王余昧铭文。

鸕杖，在吴越文化中流行，常见。吴越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非常小。

鐃于，挂起来敲击的乐器，看起来像钟，比较圆，一般是乐器上自称。

江苏武进淹城遗址

河道密布，三圈城三圈河道。东周时期城市水网的样子。

和良渚习惯比起来差不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比较常见的习惯。

城门比较少，水门看起来比较多。

吴国的地方性城市，并不是吴国的都城，与纪南城相比要小。但至少反映出一个非常典型的样式。

出土青铜器，反映当地的风格。**棘刺纹纹饰**，做法特殊，在其他地区是没有的，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特点。乐器，句鑃（gou diao），类似铙，不同地区不同叫法，或许是方言问题。随葬车马在长江下游地区是不存在的，随葬船是有的。长江下游一直是中国造船习俗最早的地方。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

春秋晚期越国王陵，土墩墓造型的遗存，本体的山（岩石山），就直接在岩石上开凿墓道，类似于甲字形的墓坑，再填土。周围有一圈水沟围起来，沟边还有竹木篱笆，“兆域”（北方也有，但不灌水），挖沟把整个贵族墓葬区包围起来。

里面的墓葬形态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拿巨大的木头搭斜的支架，做成棚，棚子上面再盖土。

墓主人不躺在墓室里面，直接躺在船里面，“船棺”作为墓主人的栖身地。

南方地区非常大的墓葬，和中原地区接触之后体现统治者本身的等级。

填青膏泥防腐是北方的习惯，填木炭是当地的习惯。

判断墓主人可能是生活在 BC497 年的勾践之父越王允常。

一方面，本身的墓葬形态习俗，土墩墓、船棺；另一方面，接受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巨大墓室、墓道，再填封土。

江西樟树国字山战国墓

吴城文化的地点。击败吴国之后，越国向北和向西扩展。

江西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越国王室的特点。南方防水环境保存极好。不再搭棚子，用楠木搭整个墓室，模拟中原地区中字形两墓道大墓。

出土了一套**鸕杖**。这方面吴越的传承性是明显的。

墓葬结构典型的接近中原风格，但墓主人仍然躺在船里面，船棺。

出土带铭文的戈，写了名字“越王勾践的玄孙翳”。作为地方统治者被派到这里。

楚文化特征。

吴越文化代表性器物特征

总体上，城址重视水系建设。

文献记载吴越两国有重要盟友，吴国和晋国结盟，楚国和越国结盟。吴国人本身不太会用车马，晋国专门派了军事顾问教吴国人。总体上，吴国车马的使用不频繁。

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数量很大。拿来做仿制乐器。

春秋中期以后，尤其吴越灭亡后。吴越的青铜器开始流散到各地，一种是大型青铜礼器，一种是吴越青铜剑。当时在各国都认为是高质量兵器。

洛阳发现吴王夫差剑、越王矛等。古吴越青铜剑是宽体剑（宽体、重型、单手持），和秦式长剑（双手持）、巴蜀地区柳叶形短剑（以飞刀方式扔）、草原地区的短剑（弯刀式，砍人）。锻造质量最高，同时注重表面装饰。

越王勾践剑，出土时非常锋利；吴王夫差矛；都埋在江陵城外的楚墓，某种情况下转移到楚国手里。转移的方式是楚国征服了越国，还是越国晚期不断贿赂或和谈给楚国送礼。

装饰比较特别，青铜武器在中国发展的巅峰。（后面马上要进入到铁器时代）菱格纹装饰。菱格纹装饰是如何做的，说法争议非常大。黑色花纹部分测量是锡，氧化后是黑色，镀锡技术在中国的出现，周原地区有出现。

镶嵌蓝色玻璃，在当时比较珍贵。

同心圆，问题，剑是铸造出来的，铸造工艺非常困难，青铜器工艺研究上非常重要。

吴越地区在青铜器冶造问题上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后世楚国包括中原地区喜欢使用吴越剑。

人形青铜器；把场景焊接微缩到青铜器上，做一些场景的装饰。

中山国的考古发现

战国比较强势的第八个国家，主要参与兼并战争的国家剩下 8 个。

来自白狄族，总体上公元前 500 多年持续到公元前 300 年。

首都中山灵寿城在石家庄平山县。城址本身、王陵。

以小型河流作为护城河，沿河而建。形状不规则；城内一般分为东西两部分，战国时期很多城市都会拿城墙分开。东城是宫殿区，西城发现商业区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集中在南侧。发现两座陵墓区，一座在西城北侧城内（军事上弱势），一座在城外（中山王厝墓）。



墓葬防侵入，“积石积炭”，东周墓葬的形态，很多墓葬会采用填土之后用巨石/木炭填死，大型积石块在北方尤其是三晋地区高级贵族的墓葬经常出现。

铜错金银的器物，动物性尊，绿松石镶嵌。形态上会有白狄族的特点，“虎嗜鹿”是北方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形态（虎吃别的动物，鹿、野猪）。（中原地区战国主要是龙凤形象）

白狄族逐渐中原化（华夏化）的过程：

灯，战国流行，汉代普及。照明，作为大型宴饮活动的设施。东周晚期高级贵族的墓葬经常

会出现灯，是油灯，上面会有一些装饰。（铁灯的出现反应向下层普及）

殉狗，明显是猎狗，与腰坑殉狗（守护功能）不同。犬比较细，类似细犬、宠物，带金项圈，刻字。

反映中山王游猎情况，“山形器”，有学者还原为仪仗/在帐篷周围插一圈。

牛角头饰，与来自北方民族有关系。

特殊器物：

北方地区也出现**失蜡法**，**四龙四风方案**（桌子），铜制装饰，嵌套木头桌面。构件繁复，用模范法不容易做。（相比曾侯乙尊盘，南方，可能更容易）

旅行用青铜器，**青铜器日常化**（尤其是高级贵族的生活）。圆形帐中心柱帽。簸箕。

春秋龙凤纹饰，细腻化的纹饰，（再早期是兽面、几何图案），战国晚期又出现新的**场景刻画型的纹饰**，田猎活动、宴饮活动（宫殿里）、战争活动；

整体上说，中山国和赵国非常相似，是邻国，包括货币系统非常相近，模仿赵国做了自己的货币系统，好处是可以贸易沟通。

《**中山王兆域铜板**》（**兆域图**），用错金的方法，平面图纸，铭文。刻画的是中山王厝王陵的平面图。带墓上建筑的陵墓（封土堆上还有建筑，不只是土堆）。五个大型封土堆，两边是王后和两位夫人，稍小靠后。图纸上还成比例标注尺寸，不再是示意图，而是目前看到的最完整的关于战国王陵的设计图样。典型双墓道大墓，墓上是大型封土堆，通过累加的方式做高台建筑，也有可能是中山王生前居住宫殿的复制。

带铭文的器物：（1）中山王铁足铜鼎，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互动样态，铜、铁的合用；（2）在表面上刻了非常长的铭文，中山王厝参与诸国伐燕，告诫子孙，吴越争夺。毛公鼎外青铜器第二长的铭文，战国时代最长。铭文不再是铸造铭文，而是**刻画**。字体非常有艺术性，“悬针体”，笔画细长，没有附笔，刻画流畅。技术上的问题，需要更坚硬的刻画工具，可能是铁制品。

三件带铭文的器物，铁足铜鼎、中山圆壶、中山方壶。

反映非黄河流域地区的北方民族融入中原的情况。另外，在洛阳也发现比较大的戎人墓地。一般认为是周王强行迁徙到中原地区由中原看管。反映原来的考古学格局被打乱。

东周时期的革新与新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开端

技术革新：铁器与冶铁技术的兴起

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开端，基础冶金工业的变化。铁器如何开始进入到中原地区。

目前看到的铁器应该是从西侧传入中国的技术，可能中西亚地区最早。目前发现最早的铁器是从新疆、甘肃向东。

• 商时期：陨铁加工阶段

灵石旌介，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庄，**晚商遗存。铁刃铜钺**。把铁作为一种更坚硬的材质放在刃部，加强锋利程度。

都是陨铁，还没有人工冶炼。

• 人工制铁的开端（西部地区）

新疆地区，冶铁集中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遗址上出现铁块，还发现有煤（温度高于木炭），但不是在一个单位发现，人工冶铁。

甘肃磨沟遗址，在墓葬里面发现小的铁条，作为随葬品，测年大约是 1300BC，相当于晚商时期，反映人工冶铁的情况，不是陨铁。

中原地区相对晚，**三门峡虢国墓地，西周晚期**，西周晚期虢国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铁刃铜钺、玉柄铁剑（铜芯铁剑），铁比较稀有，用在特殊关键部位。（春秋初期，芮国国君墓葬也发现人工冶铁的铁刃器。）春秋晚期，整个剑身都是铁制的，人工冶铁。金、玉柄，戎人墓葬，比较稀有，同时展现冶铁从西部地区向东部扩散。

• 战国中晚期铁的普及化

普及化，技术门槛的降低、成本的降低。

铁器从战国中期开始作为平民使用的器物。

铁制农具比较普及。青铜农具是比较少的，一般青铜工具也是用于手工业生产。而到铁器时代，第一次金属器开始全面地进入农业生产里面去，铁器所针对的目标行业已经非常平民化。

战争相关，两件全套的铁制盔甲，头盔保存比较完好。面部基本不暴露，全身覆盖。实战性的装甲，基本没有装饰。

铁器的发现后来反而少，因为青铜的锈蚀速度远远低于铁器的锈蚀速度，保存得比较好的铁器非常少，大部分铁器的出土状态是很差的。

金属铁器的普及（农具）与战争是有很大关系的，“**耕战**”。

战国同时发展了铁器的锻制技术和铸造技术，**使用铁器来制造铁器**，铁器的生产存在从铸造铁到锻造铁的演变，锻造铁是不需要把铁完全融化的，加热温度比较低，但只能生产单片装的器物。铁制范意味着不需要像陶范一样用一次砸掉一次，生产效率提高。

农具，人口高速增长，耕地面积扩大，为后来的军事活动提供人力资源。

金属货币制度

东周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制式化货币（标准化货币）**的产生时期。

并不是货币的产生，而是标准化、制式化货币的产生。

东方地区材质上选择青铜，中原地区长时期对于青铜铸造业是绝对第一的产业；西亚地区选择金银，制造方法上采用捶制型。我们今天的硬币是压制法，不是铸造的，开始主要是针对金银硬币，后来扩展到铜，西亚地区的技术传统。

贝币（实物货币）（数个数）、金属称量货币。

贝币的使用比较早，恰恰在内陆地区，不是随便的贝壳，“货贝”，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货币，从遗址出土来看，作为装饰品使用，不是全职货币，自然货币。很多是作为赏赐。妇好墓的海贝更多是作为装饰品。商周时期作为赏赐，商王赏赐“贝 XX 朋”，两串海贝是一朋。

东西方都有称量货币阶段，贵金属。（实物货币→称量货币→标准化货币）

计量单位，铢、两，“王赐金百铢”，当然不是金而是铜。

现代货币的名称还有来自称量时代的遗痕，‘英镑’。

金属的好处：（1）耐磨损；（2）易精确分割以及合并；（后来就变成金属可以发展为数个数，晚商的时候在殷墟就有生产“铜贝”，但晚商时期是否作为货币使用是不确定的，更多的时候看来是作装饰品，可能只是作为货币的意象）。（3）生产受控。

制式化金属货币的诞生

春秋中期开始，战国初期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三个货币系统**。（国家数量远远超过三个，反映大的经济区域的融合正在发生，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

- （1）布币区，晋系国家（韩赵魏）、郑国、王室本身。政治上比较相似，以晋国为中心的盟友体系。
- （2）刀币地区，齐、燕、鲁。赵国同时参与了刀币系统和布币系统的生产。
- （3）蚁鼻钱，南方楚国；

三个系统不是同时产生的，最早是布币系统，大致是西周晚期东周早期。

出土看上去没有实用功能的铲子，原始布币，上面还带有铭文，銎部大大缩短，杠杆原理上很容易折断，器物小、薄、轻。不再具有真实的铲子功能，更多是一种象征。

春秋中期，布币系统内部发生变化，南部周王室和郑国，平肩布和斜肩布，北部晋国，耸肩布。布币最早，发展过程也最为复杂。春秋，空首布向平首布转化。

造币的发展过程是降低生产成本，逐渐象征化；钱币越来越小，重量越来越低。

刀币系统，很小、薄，不是真正的刀。

为了防止变造货币的做法，要在边上做凸楞。

铸造刀币可以一范多件。

蚁鼻钱，楚国系统。出土数量很大。三类货币里出现最晚的。非常小，小铜块，上面写了一个文字，看不清楚，“鬼脸钱”。有人认为是铜贝的抽象版本。

战国之后蚁鼻钱和刀币系统才出现。

春秋时期侯马盟书的墓地出土很多空首布的陶范芯，国家出现金属货币系统，中原王朝后来的主要政策是入耳后发行货币。

楚国是第一个双轨制的货币系统，黄金货币，称量货币的做法，“郢爰”金版。合格认证的标志，黄金纯度很高，打上戳印代表是国家信用。

铸造货币形态一般是标准的，但是重量可能每一个差一点；但西方的敲击式，重量是固定的，可能形态上比较难看。

楚国大贵族垄断商业贸易，金版极有可能是用于大额支付。

圜钱系统

认为可能魏国出现比较早。圆孔圆钱，方便穿起来。

制式化货币进入第二个时代，各国都开始进行改革，向圜钱系统演化。但在秦以外的东方国家并没有替代原有的系统，秦在战国早中期之前没有发行过货币，到中晚期之后开始引入新的圜钱系统。

秦国一两钱，后来是半两钱。一开始是封君可以自由发钱，吕不韦“文信钱”，后来只允许国家统一铸造货币，秦统一之前已经使用半两钱。

货币系统——铸造技术的出现；金融系统的出现；各国思考如何获得最大的利益。

国家行政管理的革新和严密化

由西周建立的礼制社会、宗法制度向帝国时代官僚制、行政严密化国家的转变过程。

物勒工名制度

质量管控和追责，督造人、年代、铸造地点。

到战国晚期，吕不韦当政时期，这时要刻的更多，年代、督造者相邦、工师、丞、工匠，四级责任追究制度。逐渐向上一级进行责任追究。

信息传递与加密：封泥与符节

加密保护，印章盖在封泥上。军事信息的传递，虎符，“窃符救赵”，有资格调用军队。

虎符，错金的方法把文字错上去，虎符可以调用哪里的军队，并说明调动条件，50人以上，还说明如果特殊情况，如烽火台放烽火，可以不需要虎符调动。战国晚期军队数量庞大，中央与地方的管控。

商业关凭与税收制度

车节和舟节，记载楚怀王当政时期；关税制度，拿着这个节在特定的关口可以不交税。

标注禁运产品，即使作为高级封君也要遵守国家管控，如兵器、铜制品。

运行大量货物可以不交税，反映享受如此大的特权，楚国权力之分散。秦国是所有人都必须交税。

度量衡系统

度量衡，长度、体量、重量三个维度。

可能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度量衡系统，青铜器记录打官司，土地面积的计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出现了更加严密化的度量衡标准。

燕客铜量；商鞅铜方升；

子禾子铜釜，说明必须以国家发行的标准器的容量计算而不能以自己的容器，并辅处以罚措施。

长度，网马滩秦墓，出土**木尺**，一尺大约是 23cm 左右。

衡器方面，楚国境内发现，（郢爰金板需要精确测量），环状砝码，“钧益”铜环权，砝码基本上一个是另外两个的两倍，称量的精度很高。

各国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统一度量衡系统，证明度量衡系统在人民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战国时期，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主要是秦国。

都江堰，完全的战国时期的遗址；

郑国渠渠口遗址，陕西泾阳县，主渠道经过不断地修复。

军事设施与战场遗址

战国长城

各国都开始修建长城，各国之间作为防御设施修的边界线，与后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用处不同。如魏长城，黄河壶口瀑布位置延伸到黄河边上，在关中地区，陕西大荔县、宜君县有大量遗迹。燕国在燕下都易水河南岸有长长的城墙。燕、赵、秦三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接的地方修建长城，在今内蒙境内，后来变成秦长城。各国之间的长城逐渐废掉。

关于齐国长城的记载/“**长城**”一词的最早出现——**螽羌钟**（一组编钟/金村大墓），晋国韩氏（还没有独立成韩国），带军突破齐长城。

战场伤亡遗址

战国，全面战争，基层百姓参与到战争中去，真正的兼并战争开始，大面积的铁器应用，各国争夺土地，开发新的农田。

（1）胜利者墓葬

河南濮阳西水坡阵亡士兵排葬墓

身上有明显的战争痕迹，比如箭头、矛头还插在身体里面；有一些肢体/头颅残缺。

整体上非常整齐地排墓葬坑，非常认真的在收敛尸体。

有人认为是赵氏自己的战争，一方有晋国参与，“铁之战”，年代大约在战国的早中期，不过具体是哪次战争还不能确定。

（2）失败者墓葬

河北易县燕下都京观遗址

14 个土墩，整体人数大约三万左右。非常大规模的战争。

失败者战利品，扔人头（很多人头上都有明显的砍杀痕迹，处决型和受伤型，基本都是青壮年男性），扔一层人头盖一层土。应该是一种礼仪性质。

两种判断：（1）子之之乱（燕国的人头）；（2）乐毅伐齐（齐国的人头）

设立“京观”：春秋时期战争的习惯。盖土墩子扔人头，炫耀武力。

（3） 长平战场

中国历史上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单次战斗之一。战国时期是绝对的最大规模单次战争。

秦国大约动用了六十万，赵国动用四十万，赵国士兵大约只回来二三百人，其余几乎全部死在长平。

山西晋城永录乡。汉代以来，满地的人骨、箭头、箭镞等。

永录 1 号战国人骨坑，基本是完整的人，标准的战国士兵情况，人骨扭曲，不是坑杀，在外面就已经死了，不是后来扔进去的。

宁寿令戟（戟，戈+矛；物勒工名制度）

出土赵国士兵携带的刀币，问题是这一组刀绝大部分都是燕国发行的。可能反映赵国是采用了雇佣兵。（赵国当时处于严重的兵力紧缺的情况）

两周时期的秦文化

秦国的历史比较长，前期的历史很模糊，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

考古学上一般把进入春秋之前的秦文化称为早期秦文化，即西周时期的秦文化。进入春秋以后正式作为一个诸侯国，秦文化。秦统一中国以后称为“秦代文化”。

秦国的发展历程

“秦人东来说”——有一种说法是秦人的祖先是来自山东的，周人将秦人祖先从山东调到甘肃地区。（文献记载）

“秦人西来说”——另一种说法是秦人原本就在甘肃西部地区发展起来。

很多证据反映秦人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和来自山东地区的特征。

进入到西周中晚期之后，秦人的历史比较清晰。

作为为周王室御马的人，秦国的祖先非子。被封于秦邑作为附庸国，对抗犬戎。

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驾有功，将岐山以西地区分封给秦国（名义上，当时其实已经失去控制），原本的主要封地是天水一带，后来逐渐把都城向东迁，平阳→雍城（大约三百多年）→咸阳（商鞅变法时期）。

目前通过考古工作可以证实的地点——犬丘、雍城、咸阳。

早期秦文化的考古学反映

清水李崖遗址

典型西周中晚期的陶鬲；

墓葬出现腰坑殉狗的情况，典型商文化因素，年代是西周。

极有可能是非常早的西周时期秦国人被周王室分封过来的区域。

墓葬是东西向，（周人大部分是南北向/商王陵也是南北向，坐北朝南），秦人的重要特点，秦始皇陵是东西向。头朝西。

墓葬特点很混合。——可能是比较早的秦人，也极有可能反映出秦人来自山东地区。晚商地区关中一带不存在腰坑殉狗，晚商已经控制不了这部分地区，山东地区还有这种特点。

另外，秦人到了当地之后还发现与当地寺洼文化的融合，出土典型寺洼文化特征的双耳马鞍形口罐，女性墓葬，并列有同方向男性墓葬，可能是夫妻，认为秦人与当地有通婚。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秦文化遗址往往与当地寺洼文化（持续到西周到春秋时期）交错分布，双方的遗址点都不小。

反映出秦国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寺洼文化的马鞍口罐非常多。

出土著名秦公簋。（补一下）

秦都城的选址很特别，两周时期很少有诸侯国把都城选在险要的山地上，大堡山是很难上的，反映了对安全保障的需要。

金箔器（流失后归还），很薄，而且数量太大，不能作为衣服的装饰。我们认为应该是棺槨的装饰。——秦文化的特点，喜欢用大量纯金器作为装饰。（东部国家更喜欢错金器；西部国家更喜欢纯金器，秦国、芮国），可能和戎人有关，秦国长期和西戎、草原地区打交道，这些地方也更喜欢纯金器。

府库，一般是长条形，里面放排架，中间是主要的柱子，中间没有活动空间，一大排柱子，

中间不开门，两头开门，不是宫殿，应该是库房。

乐器坑，一组编钟，两组编磬，带着架子放下去，很整齐。还有杀人祭祀坑。很多青铜乐器表面还有麻布痕迹，应该是被包上。鎛钟，打节奏，铭文中还是“秦子”，爵位很低。这两个钟已经到春秋时期，形态和西周时期的钟非常相似。

在战国早期之前，从物质文化角度，秦国是继承西周文化最多的国家。和秦国所处的地域有关，直接接手了西周的核心地区，涉及到工业系统的转接，原有的西周工匠可能被秦人利用，秦人的许多器物都是西周风格。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秦国物质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太公庙秦公罍、秦公钟，陕西宝鸡，记载秦公世系，偶然发现。有学者认为是窖藏，也有学者认为是墓葬。大堡山遗址发现之后，认为应该也是秦公大墓的一个随葬坑。可能是秦人从甘肃东部向陕西迁徙过程之中，或许是平阳。目前还在进行补充性发掘，不应该只出土一个钟。

秦都雍城

秦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作为国家的“圣都”，每一代秦王成年加冕都要回到雍城。

陕西省凤翔县城南。目前遗迹分为两个区域，（1）城址区；（2）秦公陵园区；

从山上下来，都城放在大平原上面了。

雍城城址

夹雍水河，春秋中期开始没有城墙，城市由东向西扩展，春秋晚期形态与战国差不多，大致进入战国之后，才用城墙圈上。（钻探结果）

城西北角发现大坝，体量极大的大水池，人工改造原有湖泊，变成大型蓄水池。战国很多城市都注重城市水体。

马家庄

• 马家庄宗庙建筑

整体形态和西周早期云塘建筑一模一样，绝对承袭西周制度。（鹅卵石铺的檐下散水）

没有人祭坑，大部分都埋动物和车，祭祀坑比较密，长期进行祭祀活动。不是日常起居。

发掘比较早的最明确的宗庙建筑之一，非常完整。至今最完整的单体宗庙。

秦人是真正的西周文化继承者。

马家庄三号建筑，五进院落。和周原凤雏建筑一样，有一个类似“照壁”的东西，天子外屏，极有可能是秦国最高君主起居的位置。

姚家岗铜建筑构建

当时的工地。“金缸”，加固/装饰房梁等。

雍城凌阴遗址

比较明确的存冰遗址。冬天把冰从河道里面凿出来，存在地下室，给工厂用。

半地下的储藏间。一般半地下的储藏间要做精细的防水防潮的措施，但该遗址反而做了排水设施，应该是存的东西不怕潮。

在姚家岗大型宫殿建筑旁边。

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

陶器作坊逐渐专业化，基本只做建筑构件，大部分只做瓦，少量作砖。

从带阴文的来看，是供应比较高级的地点，宫殿。

发现比较多动物造型的纹饰。

发现残次品。

发现瓦的形态非常多，基本可以复原秦国雍城屋脊的形态。

雍城秦公陵园

所有的墓都是东西向。

秦公一号大墓，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墓葬。

双墓道大墓。

不断被人盗掘，仍出土了 3500 件文物，包括有铭文的石磬。墓主为秦景公，第 13 位国君。

挖得非常深，使得墓中的木头保存的非常好，大型整根的柏木，搭建非常大的椁室。

商代以后大型殉人最多的墓葬。《诗经·黄鸟》记载秦穆公要求大臣随葬，“歼我良人”。

墓的东南角发现很大车马坑。（每一个墓的东南角基本都有车马坑）

秦国墓葬制度反映的集权化趋势

这一时期还是以**晋楚争霸**为主，但是秦国在墓葬修建上已经非常夸张。

秦国集权化已经在春秋时期体现的很明显。与楚国形成明显对比，楚王给高级贵族非常大的经济、商业特权（出土漆器、关口符节）。

东方国家的墓葬等级是多阶层、小间隔；秦国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不体现循序渐进，财富差异很大。如晋国就是因为士大夫的地位太高形成分裂。

与各国变法的深度有关，当国君有足够的权力时才能进行最深刻的变法。

迁都：栎阳城与咸阳城

这两个城市一直用到汉代。

秦文化的代表性特征

秦文化比较特殊，由原来的地方性文化扩展到统一的主流文化。墓葬中有秦国的东西反映秦国已经扩展到这个位置。

蒜头壶、茧形壶（横着长）、喇叭口罐（越到战国中期口越宽）。这三种最多，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

秦式墓葬：（1）东西向；（2）洞式墓：先挖土坑，再挖个窑洞，人躺在洞里，中下级贵族。

（3）屈肢葬，基本是跪姿状态，其他国家也有，但没有蜷曲得这么严重。学者的解释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模仿婴儿形态，或当时的坐姿（没有椅子）。

纯金器的使用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秦文化的陶器、葬俗等方面的特征自战国晚期开始，伴随秦的征服逐渐向东扩散。

湖北郑家湖遗址，超出了当时各种文化分立的状态，全国文化逐渐统一，但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覆盖，而是各国文化混同。秦人的墓，混合秦式和楚国式（墓箱而不是洞式墓）。

青铜时代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与融合

北方长城沿线地区

东段：燕山南北地区；西段：黄河峡谷地区，晋陕高原。

两个区域的发展演进基本一致，由定点向游牧转变。

游牧和狩猎采集经济是不同的，狩猎采集以自然界动植物为主，农业以种植业、牧业以家养

动物为主。家养经济的不断扩大。

第一阶段公元前 2000~公元前 1000，北方区以种植农业为主，公元前 1000 左右，开始发生明显的重大变化，种植农业退缩，以牛马为主的畜牧业不断上升，猪的比例不断下降。定居农业基本丧失，定居聚落也逐渐消失，战国晚期，北方草原地带已经看不到比较大的聚居聚落，但不意味着没有人。

(1) 带有大型陶器的聚落。会制作比较精良的陶器。

转向游牧之后不会制作太大型的陶器，陶器逐渐粗糙化和轻便化。也不会做高温陶器，而是做低温陶器，没有纹饰。

(2) 主要以青铜兵器、工具为主。(中原地区一直是青铜礼器为主)

东段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段的代表性文化是**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朱开沟发展逐渐向南移)。

朱开沟文化

开始时间很长，基本可以和石峁文化齐平，而且延续下来。

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

二里头晚期到晚商前期(青铜阶段)，内蒙古第一支青铜文化。

公元前 1900 左右，出现小型青铜工具、装饰品，并没有出现大型青铜兵器等。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开始出现大型的青铜兵器制造，尤其是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不同的青铜器传统)，并出现了典型的商文化青铜鼎等器物(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300 年，晚商时期，青铜器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朱开沟文化早期阶段与陕北石峁文化有一段很长的并行期；石峁庞大的城市防御系统，如果军事上十分强大的话可能不需要。朱开沟和石峁的时间不断靠近，可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政治上对立的情况。朱开沟，也发现有城市防御功能的设施。

定居式房址

半地穴建筑，精致的白灰面加固——很多这样的小房子，典型的定居生活。

以种植粟(小米)为主。

遗址中有发现动物，典型的猪、羊、牛都有，进入家养动物的时代。其中，猪的比例最高。

粟和猪的农业搭配(种植业、畜牧业)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

出土石刀，应该是收割工具，反映种植农业的情况。

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分歧，但是没有出现像二里头一样宫殿区（大型封闭宫殿建筑）和居住区的分别。社会分化主要体现在殉人阶段，主要以男性墓主人随葬女性为主，但墓葬的规模也不会特别大，殉葬人数 1 人、多人不等，男性在中间或“棺”的位置。

陶器相对来说制作比较精致，没有和中原地区在精细程度上有很大区别；陶鬲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也是比较接近的，很多陶器非常大，也许是做大的储藏器使用。——明显的定居农业生活。

玉器：和中原地区的交流，朱开沟文化从来没有发现过玉器（比如玉琮），但新发现的沙日塔拉遗址出土典型的西北地区的玉琮，素面，与良渚文化玉琮有很大的区别。//牙璋的变体的出现——使用相似的礼器，证明在宗教上与外族有交流。

北方式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草原式青铜器

朱开沟文化后半段开始出现典型的青铜器制造，最典型的是青铜短剑。直接塑造了整个北方草原区青铜器的主流，**青铜兵器（短剑为主）**。

铜刀和中原地区用的铜刀不同，中原地区比较小，U 字型，作为小工具；而朱开沟文化的铜刀比较大，可能作为兵器。

典型的以武器为主的青铜器组合（中原地区青铜器，以礼器、鼎等为主）

也会和中原地区有交流，比如青铜戈，类似中原地区的青铜器。

李家崖文化

较晚时期：基本分布在黄河峡谷地区，没有过壶口瀑布。

李家崖文化的研究是比较曲折的过程。起初晋陕高原黄河沿岸发现过很多青铜器，来自于墓葬、窖藏还是其他情况基本都是不清楚的。这些青铜器被命名为“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群。——必然和某个人群/考古学文化相关。但很长时间内，这一区域没有发现明显的遗址。

1980 年以来，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发现了遗址，年代大约在早商到晚商时期，青铜器与“石楼—绥德”的类型差不多。主要分为三类：

- （1） 典型的晚商文化青铜器，食器、酒器等，应该不是当地铸造的，安阳等铸造流入。
- （2） 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短剑等青铜兵器；
- （3） 当地风格与晚商风格混合的铜器，整体上是鼎、簋，但会做很多当地的装饰，尤其

喜欢加**小铃铛**、小动物。

李家崖文化的人群从哪里来一直是没探讨清楚的问题。过去的认识是，朱开沟文化的人群在晚商不断向南移动，到黄河峡谷地区，形成李家崖文化。空三足器（陶器）与朱开沟文化基本相似。主流解释。但移动的原因各方解释不同，气候变干变冷，追求农业。

曹老师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判断。区分西瓜渠文化和李家崖，认为李家崖文化的陶器和吕梁山以东的考古学文化更加相似。（进一步论证）

社会经济状况：

很多是定居遗址，发现有城址（带城墙，不是游牧性）。黄河峡谷区不是平原，黄土高原沟壑万千。当地地形、地貌非常崎岖，陡峭的崖壁。

大型陶器，不易搬运。

大型遗址，宫殿区。——黄河两岸都有李家崖文化，山西柳林高红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建筑，明显不是个人居住使用，大型仪式场所。陕西清涧辛庄遗址大型建筑群，**殷墟以外晚商地区规模最大的宫殿群**。一个院落套一个院落。——这一时期李家崖的定居生活是非常明显的。

青铜器方面：

对应“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

（1） 殷墟类型，在商式地区有发现类型相同，甚至一模一样的。一般认为不是当地铸造的，尤其是安阳铸造，以某种方式进入到这一地区。（贸易、战争等）。

（2） 北方式青铜器，最明显的是短剑/刀的柄部，小铃铛或小兽。铃首剑、兽首剑。在殷墟也有出土类似的北方式青铜器，也体现双方的交换。

小型工具器物上面做小型动物装饰。器物本身在殷墟等都会有，但柄部会做一**小组群像型的动物造型**装饰。

“匕”，铲食物的勺子。

特殊，青铜靴子，某个器物上的装饰件。

（3） 混合式青铜器。①整体器类和商代差不多，但纹饰风格等有本地特点。圈足器物中往往会加一个小铃铛，端器物的时候会响；②整体风格是当地的特色，器类在商地区没有看到过，但装饰风格是商文化的装饰风格。极有可能是本地生产，仿制商文化的器物。

李家崖文化到公元前 1300 左右就消失了，人群明显减少，关于李家崖文化消失的线索和过程没有明确，可能认为是和商王的战争中失败。（文献与考古学材料的对照，gui3 方）

夏家店下层文化

典型的定居生活形态。（VS 夏家店上层，典型的游牧文化）

燕山南北地区，东段；

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

红山文化也是分布在赤峰、辽西、河北省北部地区。典型的种植农业区。后来进入长时期的萧条阶段，红山文化衰落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大约有 1000 年。人群分散化居住，退化的表现。

中国粟作植物的起源也是最早在这一区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以粟作植物为主的定居农业。公元前 2000 到公元前 1400，夏家店下层衰落后，又经过大约 500 年的萧条。夏家店下层是青铜器发展的高峰。

以非常多的石城遗址著称（可以看做小型石峁），非常密集。以赤峰市为中心，沿着河道密集的石城遗址发现。小型村落都会建石头城墙，非常重视防御色彩。有的大的有的小，三座店、二道井子、夏家店是发掘的三座石城遗址。最大的是池家营子，但没有发掘。

三座店马面防御结构，方便射击，军事防御作用。

石头建的圆形小屋子，两道夹层墙，保温，也可能夹层作储物间等。有一些比较大的，可能是首领或议事中心。会有一些社会分级，但没有中原地区那么严重，没有出现跨数量级的大小分别。聚落之间也会形成等级差别。

器物以典型的制作比较精良的陶器著称，炊器以陶鬲为主，空三足器。鬲、yan。拉得很瘦长，筒腹器。自己可能不制作青铜容器，应该是从商传过来的。自己会生产青铜兵器和小型工具。

夏家店文化的埋葬方式和居住区差不多，宫殿区和居民区分不开，所有墓地也埋在一起，看墓口的面积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分别。

彩绘陶器，和筒腹鬲是一样的，加上彩绘。仰韶文化的彩陶是烧制上去的，在烧之前就画上去，可以使用。而夏家店下层的彩绘陶器是后来烧好之后画上去的，用来随葬，使用很容易就掉了。——区分生死，定居生活的习惯。

最多出现的谷物是粟，动物最多的是猪，也有牛羊，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马。农牧搭配和中原地区的搭配一致。

长城沿线青铜文化的转变

公元前 1300 年左右，原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内的遗址数量大幅度减少，人口面积也变小，整体上不再定居。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 1400~1000 之间的物质文化转化过程还不是很明显，主体为魏营子文化，遗址文化非常少，底层很薄。恰恰反映出人群可能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移动的生活状态。

1300 之后，朱开沟文化的人群可能开始出现向东移动，夏家店文化区域开始出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第二阶段（向游牧）

总体趋势：

- （1） 陶器越来越粗糙、体量越来越小、陶器的数量也减少；
- （2） 稳定的遗址点越来越少，桃红巴拉时期生活遗址点基本找不出来，墓地还有。
- （3） 种植农业基本消失掉，墓地里面随葬的动物马、牛、羊的数量越来越多，猪的数量越来越少；
- （4） 青铜器方面，兵器仍然是主导，同时出现很多车马器。车的铜配件，马具等越来越多。
- （5） 公元前 500 年之后，各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一致性越来越强，战国晚期，基本上和秦统一中原农业区一致，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统一的游牧文化。中原农业区的统一和北方游牧区的统一是基本同一时代的，形成长城南北对立。

从东向西

夏家店上层文化

公元前 1000~600 左右是繁荣期，后来逐渐衰落。

大型陶器不做，只有小型炊具，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素面，短期使用可能就扔掉了。

没有防御性很浓的石城建筑遗址，小型的半地穴或地面建筑，遗址的规模也比较小型，人口很分散。

还是有小型农业，出土石刀，但比例越来越低。——游牧人口从事的农业是粗放的农业，恰恰和粟是很配合的。夏季游牧时粗粗地撒一把粟的种子，然后不进行灌溉，靠天养活，轮转回来之后进行收割。——粗放型种植农业。

牛、马、羊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猪。

马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尤其是青铜器装饰等，各类艺术品表现马的形象。很多器物上面有人骑马的形象。

本身用于驾马的车马器，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主要的类型之一。

做大型铜容器进行游牧是不太现实的。

青铜兵器，短剑，从朱开沟文化延续下来的习惯是一样的。曲刃短剑，脊部明显突起（和吴越类型的青铜剑，表面精致，差别比较大）。刃部差异不大，主要是柄部类型不同。

盔甲，头盔顶部可能做小型动物装饰。（尤其是马）

两类青铜容器。（1）一类是本地做的，大部分是素面，比较简单粗糙，以生活式的为主，便于携带，不大，没有大型、重型礼器。没有纹饰，但可能有小的动物装饰，本体素面。（2）中原式的，纹饰，有一些还带有铭文，表明根本不是当地做的。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可能经过多次转手。

桃红巴拉文化

内蒙古西端，原来的朱开沟区域。游牧化倾向比夏家店上层更高，没有发现任何定居型遗址。

基本靠墓地，而且墓地很散，埋的都是中高级贵族，随葬的金银器很多。每个墓之间的距离都很大，超过几百座墓的大型墓地就没有了。

陶器的制作更加粗糙，基本不作为主要的生活用具。

青铜器的类型比较多样，包括金银器、铁器等的生产。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高很多，风格以动物纹饰和构件为主。骑马放牧的纹饰。各种动物都会有，最多的形态是“虎食鹿”。（中山国

虎食鹿错金银，中原技术+北方主题）

桃红巴拉文化的中晚期可以认为是匈奴文化的一部分。

高等级的金器，匈奴单于的金冠，本身质地是**纯金**的，比较厚重，和中原地区的金箔器不同。

动物型装饰。鹿型金怪兽，混合集中动物，多体动物，山羊的站姿，鹿型，鹰角，应该是冠饰。耳饰，出土范围已经不只是内蒙古草原区，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区包括今天的蒙古等，镶嵌绿松石宝石。黄金牌饰，金腰带，分布范围也不限于上述几个草原区，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大范围的族际融合出现——*纯金器

桃红巴拉极有可能是匈奴帝国一个地方性的分布区，区域性的文化。

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

军事对手/贸易伙伴

军事对手，战国北方边境的国家开始修长城，防御北方草原区。赵武灵王吞并林胡，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

但双方还具有非常强烈的贸易关系，与东周时期的技术革新有关。西沟畔墓地出土的银牌饰正面是典型草原主题，而背面的物勒工名、刻铭、重量等，不少都是中原制作，然后通过订做和贸易输送到草原地区。

金牌的模子发现在咸阳城内工匠的墓地，背后也刻有中原地区的重量系统、物勒工名制度的刻铭。

草原地区形成逐渐统一的游牧帝国，匈奴帝国，战国晚期。

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统一过程实际上存在一个相互刺激的关系，加速中原地区形成统一的防御共同体，北方地区也需要应对中原地区，形成统一。军事刺激、经济交易。

北方长城沿线的考古学文化，长城有很多条，是沿着秦长城。（汉长城已经到新疆地区，没有那么远）。这些考古学文化正好压在秦长城的线上，形成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

秦统一之后的军事进攻路线：

- （1） 岭南地区，进入广东一带；
- （2） 占领匈奴的黄河以南的河南地。桃红巴拉文化的核心区，产马，对秦的军事相当重要。

早期丝绸之路的形成：甘青地区的青铜时代

甘青地区

新石器时代彩陶传统形成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束。直到青铜时代晚期，还在生产彩陶。

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向甘青地区（西）转移的结果。彩陶传统的保留。

甘青地区在这一时代变成了多方向人群的汇聚的结果，中亚西亚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三个方向。

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

东段以天水、兰州为中心，大河穿过，黄河支流，整体地貌上是黄土高原向西的延伸。甘肃省东部发现的遗址也往往在河边的二级阶地上。

西部，河西走廊区，南侧是祁连山，北侧是戈壁沙漠，人口主要聚集在祁连山北麓的山麓地带，祁连山雪水形成垂直于祁连山的短促河流，绿洲城市，长约 1000km 的河西走廊区。

齐家文化（东段）

1924 年安特生，当时命名为仰韶文化齐家期。（齐家文化是安特生发现的六期里面时间最晚的，虽然彩陶制作比马家文化简单）。

齐家文化分布较广，继承了原有的甘、青、宁、陕、内蒙古之间马家文化的地区。

测年大约在公元前 2100~1600（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比较并行）。（甘青文化的测年都是不太确定的，很多遗址会比较难判断，尤其是河滩地的遗址。）**更在乎的是相对年代**。具体文化之间的绝对年代不断推翻很多次了。

齐家文化本身完成了从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时代的过渡。

典型的以种植农业为主的社会，尤其以粟为主。有一定的畜牧业，猪羊都会养。

聚落在离河流不远，西北地区会出现季节性河流，一般来说齐家文化的遗址都出现在常年河流的附近。

以**竖穴偏洞室墓**数量居多。

陶器较多，典型的是**大双耳罐**，耳朵从口部开始，还有一些变体，比如双连，三连，四连，或者做四个耳。

齐家文化的彩陶基本比较简单，黑彩，单色，几何图形。

空三足器是很少的，鼎、鬲等。一般认为是与石峁人群和陕西省北部的人群交流的结果。

齐家文化非常流行做**玉器**，西北地区的玉器整体上是比较少的。（1）齐家玉琮（西北）。和良渚玉琮（东南）是两个代表体系。齐家玉琮要比良渚晚很多，但一般认为制作来源还是来自东南良渚。齐家文化的玉琮都比较瘦高一些，薄，大多都是比较简单的素面。（2）玉璧。（3）玉斧。后来也进入到四川，和彩陶的流动是一致的。（4）四孔玉刀。（和二里头文化玉刀十分相似，可能是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流）。

青海喇家遗址：青海东部靠近西宁。典型齐家文化。

以玉器加工作为主业的地点，发现切割剩余的玉料，生产玉璧时形成的玉芯。

遗址的毁灭：地震以及后来的洪水。（发现最早的面条）。

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重要的流通方向不是自己使用，而是向外输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省南部的陶寺遗址、包括石峁遗址等，都与齐家文化的玉器类似，作矿物发掘也是与齐家文化相关。

齐家文化的铜器

齐家文化的青铜器是年代相对很早的，本身的趋势是越向西越早。

不太生产青铜容器（中原地区），生产**工具、武器、小型装饰品**为主。整个西北地区的习惯。容器自己很少做，有的是中原地区输入的。

西宁沈那巨矛，带倒钩，明显仿制于欧亚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的倒钩铜矛。表明青铜武器铸造习惯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装饰品，半月形项圈，早期用青铜做，后面出现金银制。喇叭型耳环，铜的、金的。也是整个欧亚地区都会有发现。臂钏。

反映早期冶铜技术由西向东的传播，在西部发现更早的样式。

特殊器物——铜镜。汉唐考古，在中国后期变得非常流行，汉代以后就主要用来照面，宋以后普遍为生活用具。早期铜镜最早全部集中在齐家文化，中原地区最早的发现来自于妇好墓（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北地区（铜镜）和北方草原区的青铜器（兽首刀））。最早是萨满降神时用的（跳大神）。萨满本人身上要挂很多磨得非常亮的镜子。早期的镜面打磨的不是很好，大概也是这种功能，看人面可能会扭曲。

甘青地区文化的传播总是多方向的。西侧的铜饰品向东传播。而中原地区接受了初期技术之

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精加工和复杂化。开始将自己的宝石工艺，如绿松石镶嵌技术结合到一起，生产青铜嵌绿松石牌饰。兽面的纹饰风格也是典型的中原风格，从东向西的过程。

齐家文化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逐渐消散化。后来在 BC1500、1400 左右形成三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自西向东分别是**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有明显不同。青铜器的差别不大，主要的差别在陶器上。

考古学文化结束之后——人群到哪里了？

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居址和墓地都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整齐的墓地（墓和墓之间排列整齐，后代知道，而且尊重）——反映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的过渡。也就是人群没变，是同一的血缘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群的迁徙，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习惯、风俗的变化。晚期的墓葬开始出现偏向于寺洼文化的陶器，同一个墓葬可能同时出现寺洼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陶器。只是在物质生活习惯上生产了新型陶器。

早期中国人工制铁的开端——最早有来自磨沟遗址的发现，人工冶铁的小型工具，出土于墓葬中，整个外部环境非常安全，不太会是后期扰动的情況。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BC1400 左右，比中原地区人工冶铁的年代要早得多，要到西周晚期，三门峡虢国墓地，铁刃铜戈，公元前七八百年。

西侧走廊区

西城驿文化

在靠近张掖地区，2010 年以来进行大规模发掘，补充了 BC2000~1700 在甘肃省中西部包括新疆东部地区文化的缺环。同时这一遗址发现了早期的冶铜术，比齐家文化还要更早一些。小型铸铜作坊。年代比东部区域早一些。

向东传的社会现象。西城驿文化分为两个部分，西部都是单纯西城驿的东西，而东侧的遗址往往都是混合的，包括齐家文化的陶片，尤其是冶铜地点。反映出来冶铜是通过双方不断学习、交流传播的。

另外，发现**麦类种植农业**比较重要。小麦也是逐渐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粟作农业开始降低（早期北方主要农作物）。

四坝文化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相对年代是续在西城驿文化之后。遗址上面盖了一层四坝文化的堆积。

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等。

当地的人群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陶器的风格序列是整齐连续发展的传统。

山丹军马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养马地点。公元前 1700~1300 之间，已经开始养马。中原地区最早的家养马要出现在殷墟时期，四坝文化在相当于早商的阶段已经发生。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养马是来自哈萨克斯坦，东传。

原有畜牧业中猪的比例在逐渐降低（对水量的要求比较苛刻一些），养羊比较多。

四坝文化彩陶，当地双耳罐和四耳罐比较多。但造型有一点区别，矮胖，细颈。陶器动物装饰。人形彩陶罐，实际上完全是一个罐子，用彩陶把衣服画出来，**很重要的是穿的是裤子**，而不是袍子。彩陶的笔法一般比较粗糙，本身笔也比较粗。

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有一大段时间是共存的，有一些交流，在四坝文化中发现齐家典型的双耳罐，表面上贴绿松石的做法。

农业在西城驿文化中小麦的比例已经上升，四坝文化基本小麦已经占绝对主导。在动物方面，羊的比例不断升高。

在铜器方面，四坝文化延续整个西北地区，工具、武器、小型装饰品。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和特点，**青铜权杖头**。权杖头是从西亚地区逐渐向东扩展，仪式性。四个羊头动物造型纹饰。权杖头是东西交流很重要的象征。（参考《耀武扬威》，权杖头的传播过程）

还有发现金饰品，目前看到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金制品是中国最早的纯金饰品，不是金箔器。比如小型金耳环。纯金制品的制作过程也是从西向东。

四坝文化结束之后，逐渐发展为骗马文化（偏西）和沙井文化（偏东）。（发现太少）

东部的进一步发展

卡约文化

大约 1600~500BC，整个商时期和西周时期。

发现的居址很少，以墓葬为主。与北方草原区游牧化之后的墓葬不同，还是以墓地为主，依然是**定居型遗址点**更多一点。基本全部集中在青海省东部地区，河湟地区（黄河、湟水）。

畜牧业以羊为绝对的核心，很多墓葬里面都随葬羊。

陶器比齐家文化更粗糙，依然在做彩陶，非常小的罐子，器类变得很少，双耳罐，画一些动物纹或几何纹饰。

权杖头的数量变多。

卡约铜器主要是兵器。西北地区流行的是战斧（中原地区流行的斧称为“钺”）。西北地区的斧钺和中原地区有比较大的差别，通过套管的方式把斧插进去，**管套方式**装柄。中原地区是穿孔，用绳子绑上去。

权杖头普遍，做的样式也变多，比较复杂，动物形象。

卡约时期的另一个重点发展是延续从齐家文化开始生产纯金器的习惯，某种程度上代替原来的东西。比如青铜项圈→黄金；盘丝的金耳环；金贝（包金木贝，里面还有很多木渣子）。应该不是货币，可能是装饰品。但这种使用贝的方式可能代表和中原地区有一定交集，对海贝的价值有认同。

辛店文化

安特生发现。

海拔高度要降一些。已经分布到黄河沿岸。现在也基本是旱作农业区。

卡约、辛店、寺洼文化基本都流行偏洞室墓。

随葬动物牺牲的现象比较常见，基本没有猪。

青铜器还是工具、装饰品、武器。同时有少量铜容器。人面柄首铜匕（勺子）。

延续彩陶习惯。基本没有本地生产的三足器。基本都是平底器和环底器，越往东三足器越多。

装饰风格是本地彩陶风格，辛店陶器也是各种双耳罐，最大的特点是绘画的内容很多很具象。

很多器物上有**双钩纹**。有人认为模拟山/羊角，本身也是后期的释读。

辛店文化的陶器普遍都发土黄色。（齐家偏红一些）——同一个地区的选料方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陶器研究要深入到制法上面去，才能把握形态。

寺洼文化

原本也是齐家文化的分布区。磨沟遗址所在地。典型的从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的遗址点。

卡约、辛店和寺洼的交界不是明确的，遗址点本身是沿河谷走的，按照绝对的地理方位反而不太合适，比较好沿河谷区分。

寺洼文化彩陶的数量比西侧的两个文化已经减少很多。同时，空三足器鬲的数量增多，主要的炊器。

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马鞍形口罐**。很有可能是水器。

寺洼文化在墓葬方面依然是典型的动物式墓。

年代主要是从晚商到春秋早期，和先周人群、西周王朝和后来的秦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先周文化三种来源的可能性，其中一种被称为可能是戎人，刘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陶器很像。商时期被称为“羌”，西周时期的“戎人”。该群体进入到东周时期后，政治上逐渐纳入到秦国的统治之下。西周时期寺洼文化和秦文化属于交错共处分布，可能是敌对或共处，还没有纳入统治。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共有特征

双耳罐，三足器总体偏少，环底器和平底器。

彩陶长时间流行，灰陶很少。

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

社会分级不显著。墓葬没有差异极大的社会分级。有贫富分化但差异没有那么大。

后来该区域被游牧帝国和农业帝国分化。社会分级不显著证明政治控制不强，在对抗外敌时不容易抵抗。成为争夺之地。没有大型宫殿区，所有建筑的形制往往是一致的。

麦作较早传入且比例逐渐升高，代替粟作。（中原地区很晚，要到汉代，甚至魏晋南北朝；唐代两税法，麦子和粟收割的时间不一样，粟和麦是轮作的。至少到唐代麦作才成为主要。）

*传播——麦作、冶铜、冶铁、马、牛、羊，由西向东；粟作、彩陶、制玉、精工金属器（如锻造铁到铸铁）等技术由东向西传入新疆、中亚地区。——河西走廊通道逐渐形成。

金柄铁剑，宝鸡益门村戎人墓。在秦的统治之下，戎人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马甲塬戎人贵族墓地，社会等级分化。战国中晚期。出现非常典型的**茧形壶**（秦文化典型代表）。

新的技术出现——**鍍金银**。在铁器上类似错金银的做法，但铁器过硬，不能开槽子。

车马坑，只埋马的头和蹄子，头蹄葬。车身上装饰有大量金银铜装饰。

有的车表面上是作非常繁复的金银装饰的。彩绘玻璃的珠子。车子一般是不实用的，陪葬品。

戎人的高级首领是秦人治下的。享有非常高的财富地位，是秦和西侧国家贸易的中间商。参与向北向西的贸易交换。

甘青地区是进入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重要的通道。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

论述题，*逻辑；说一个事情一定要给出考古的例证。周人怎么处理殷遗民，什么是殷遗民，分很多等级，贵族、一般的平民、手工业者；不同的方向。系统性地想一下。

古蜀地区的神国化与世俗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整个西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很不一致。

四川盆地虽然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区域，所谓的“隔绝”也只是外在的政治势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还是有交流。

自然隔绝：

北边是秦岭山地，西边是青藏高原，东边是三峡地带，南侧是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

历史传说中的古蜀地区：

成文的记载基本都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北方的秦汉人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以回忆的方式。

汉代扬雄《蜀王本纪》，收集民间传说。“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传说中蜀帝的名称。《华阳国志》等。

蜀地较为可信的记述开始于战国时期，蜀与秦、楚发生军事接触，秦楚两国开始出现对蜀地的记载。已经进入晚期蜀文化了。在此之前成为早期蜀文化。早晚期蜀文化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

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目前来看，旧石器时代似乎是没有大规模人群居住的。新石器时代的这些人从哪里来是有疑问的。在川西山地区有一些新发现）岷江河谷，南北向交通要道。

阿坝茂县营盘山遗址，反映出强烈的来自于甘青地区马家文化的人群，彩陶。（马家风格的波浪形纹饰，反映有人从甘青地区向南进入成都平原部分地区。）直线距离，从甘肃陇南到四川地区是非常短的。而从甘肃马家到寺洼的直线距离却是非常大的。西北地区石棺葬习惯。

石棺葬，半月形地带（丝绸之路考古），极其相似的物质文化习俗。

发现玉器，虽然质地差了一些，但与甘肃省东部的传统比较相似。长条形玉斧。甘青地区与四川盆地的联系。

宝墩文化，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岷江形成的扇形冲积扇上。包括好几座城，形成带有围墙的小型聚落。

2500BC~1700BC 左右。（结束和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差不多）

宝墩文化的陶器基本没有三足器，不论是空三足还是实三足。更多是平底器或圈足器。

农业发生变化，甘肃地区马家文化这一时期通常是粟作。但出了岷江河谷之后转为**稻作**。人群是北方下来的，但种植习惯适应当地。

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发现大型建筑，礅墩的做法。

巴蜀地区长期的习惯，使用**象牙**。象牙杖。

马家文化并没有带入青铜文化，自己当时都没有，是新石器时代的人进入。

三星堆文化

由此前在成都平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宝墩文化发展而来。

1700BC~商末周初（1000BC）。大约持续七百年。三星堆文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度集中的中心性聚落——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在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制造水平，与殷墟的技术基本是可以对应的，只是制作内容不同。另外，器物类型和特征完全不同。

整个社会活动中神权色彩非常浓重，军事权、政治权等看起来并不重要。很像青铜时代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的玉器）。

葛维汉，博物学家。在燕家院子做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提出“光汉文化”，后来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34 年，也刚好是史语所挖掘殷墟的时期。

非常大的青铜时代城市遗址。中间低两边高（中间马牧河的冲击）。一座大城三星堆大城和三座小城。

三星堆的城墙和郑州商城的城墙形成鲜明对比，三星堆当地的土不太适合做大规模夯土，是推土的，土质比较松。

三星堆遗址最下面压的是宝墩文化，中间是三星堆文化，上面是十二桥文化。前后两个时期遗址是比较小的。几乎没有在三星堆地区发现墓葬。

青关山建筑基址

本身是比较大的房址。对这一建筑的性质认识是不同的，办公场所、仓库等。但从发现的遗物本身和规模可以看到使用者地位是很高的。

发现最多的是陶器，主要是**平底器（小平底罐是最多的）和尖足器**。三星堆的特点是做得极其瘦高。

鸟头把勺，斗的部分是当地非常多的小平底罐。三星堆分期的重要器物。

一号坑以玉器和小型青铜器为主，二号坑全部是青铜器，上面盖着很多象牙。

很多器物在出土现场都是破碎的，一种是人敲击的，敲得非常碎；另一种是在扔的时候相互撞击形成的。完整的青铜器铺在下面，垫土，敲碎的是烧过的，在上面，垫土，最上面铺象牙。虽然是被敲碎的，但整体非常讲究秩序。似乎不应该是军事失败的破坏结果。

纯净的黄泥土封层；炭渣灰烬层（发现非常严重的焚烧痕迹，灰是在别处烧完才倒进来）；象牙层；青铜器和玉器层。

祭祀坑的排布，成对。一对坑里埋藏的东西是很相似的。7、8 埋的非常互补，小铜器/大铜器。除了 5、6 号坑，都是一次事件中一次性埋藏的，同一棵神树被分着埋到几个坑。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

（1） 外来风格青铜器：

主要是青铜容器，礼器。以尊、罍为核心的青铜组合，圈足，没有发现任何三足器。主要作为储藏器使用，储藏贝壳、小型玉器、青铜器等。现在看来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或者商文化的分布圈。

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

空三足器陶圭或陶鬲。

（2） 本地风格青铜器；更多。以具象为主，和中原的容器不同。

① 青铜面具；大部分是突兀眼睛的，还有少量是眼睛处要伸出来的。鼻子上有的有“花冠”。面具的额中心和耳朵两侧要开方孔，而且方孔不是一开始铸造上的，都是后来冷处理凿开的。推测可能是用来悬挂的。（有可能使用者和生产者不是同一拨人，使用者进行改装）

② 青铜人头像。最多是带有 V 型领的。面目差不多，眉毛会在中间涂黑，画眼睛。主要是发型不同，发髻、缠头长帕子；平顶（发辫子，涂黑，交错的地方应该是红头

绳)/圆脑袋。可能代表社会中不同社会身份。(官职/阶层/...)

③ 全身型青铜像。穿长袍的人才拿东西，每个人拿的不一样。拿着鸟头杖；龙；扭头跪坐人像，夹板。(融合型青铜器，下半部分是三星堆的人像，上面是容器，分次铸造然后进行焊铸。一半外来风格，一半本地风格。)

④ 动植物造型青铜器；植物主要是树的形象，神树。现在看来有两棵大的两棵小的。在其他坑会找到很多枝杈，不完整。树上会挂很多东西，铃铛、黄金树叶、青铜神坛，博物馆只能展出复制品。(南方都喜欢做**场景型青铜器**)

⑤ 眼形器；龟背网格形器，中间是玉器。

出土的兵器微乎其微。应该不存在强大的军队。

金器，鱼鸟纹形态，木芯上包金箔皮。

玉器主要是玉戈和玉璋。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玉璋在三星堆遗址。(晚商时期殷墟已经不用了。)

三星堆遗址结束在商末周初。短时间内人都不在这里居住了。

十二桥文化

成都金沙遗址

明显社会走向衰落，器类和三星堆都一样，但质量明显粗糙。

三星堆文化衰落性延续。

晚期蜀文化

典型长江中游地区做法，大型墓葬开始出现，单墓道大墓，开始出现从来没有过的三足器(楚式)，船棺葬。社会生活开始变得世俗化，宗教东西大量减少。也开始铸造各种各样的兵器，蜀地自己铸造，写自己的文字。(吴越重剑，秦长剑，北方净剑)，巴蜀地区的剑是短剑。社会风俗的变化，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以军事和政治等级制为基础。宗教权已经不是中心。秦定巴蜀，茧形壶的出现。秦人征服巴蜀要比秦文化进入巴蜀要晚。